广州与海洋文明系列

蔡鸿生／主编

东南亚华侨与广州

牛军凯／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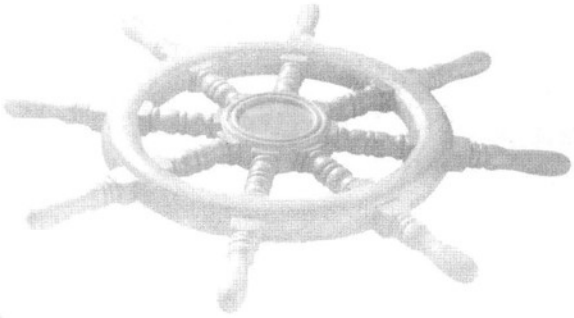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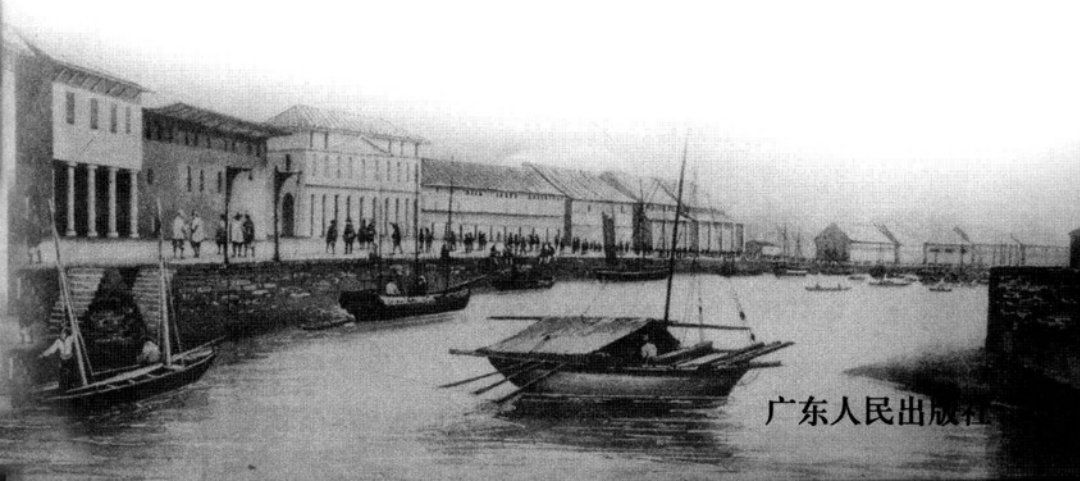
广州与海洋文明系列

蔡鸿生／主编

东南亚华侨与广州

牛军凯／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南亚华侨与广州/牛军凯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12
（广州与海洋文明系列）
ISBN 7－218－04179－5

Ⅰ．东…　Ⅱ．牛…　Ⅲ．华侨—历史—东南亚　Ⅳ．K296.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0702 号

责任编辑	柏　峰　赵殿红
封面设计	方楚涓
版式设计	翁少敏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韶关二九〇研究所地图彩印厂 （厂址：广东省韶关市工业东路 33 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30.25
插　　页	16
插　　图	137
字　　数	55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000 套
书　　号	ISBN 7－218－04179－5/K·857
定　　价	80.00 元（全八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83791683　（020）83503547

《广州史志丛书》编审委员会

主　　任：杨资元
副 主 任：程　慧　陈泽泓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李明华　张荣芳　张影华　陈锦鸿
胡巧利　赵春晨　唐文雅　龚伯洪
曾昭璇　曾　新　甄炳昌
执行委员：胡巧利　张影华

《广州史志丛书》编审委员会委托编审委员陈泽泓、胡巧利负责审定本书。

《广州史志丛书》出版说明

当代的地方志工作，是一项具有延续性的长期事业，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建设系统工程。它不仅仅是编纂一部志书，更需要多方位地开展地情调查、地情研究和地情服务。只有这样，地方志的资政、存史、教化功能才能得到更好地发挥。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在编纂广州市志的同时，还积极发动修志人员和社会力量广泛开展地情调查、积累地情资料、开展地情研究、提供地情咨询服务、编写地情丛书、整理旧志、进行方志理论研究等，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由于志书体例的局限性以及一部市志篇幅的限制，许多地情资料和地情研究成果不能入志。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将有关的资料和研究成果以《广州史志丛书》的形式公开出版，为广州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广州史志丛书》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有关广州历史情况的旧方志和其他古文献的整理；

二、今人有关广州地情的著述、研究成果；

三、史志理论研究成果。

这套《丛书》的编审工作由《广州史志丛书》编审委员会负责，并由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实施。

《广州史志丛书》将陆续出版，恳望广大读者对本《丛书》的内容、形式及编辑出版工作提出宝贵意见。

《广州史志丛书》编审委员会

二〇〇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总　序

蔡鸿生

广州位于南海之滨，从古代贸易港到近代通商口岸，走过了漫长的路程。它的地形地物，长期被形容为一艘“大舶”，即巨型海船：“花塔、光塔为一城之标，形胜家谓会城如大舶，二塔其檣，五层楼其航楼云。”（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9）“会城如大舶”一语，尽管出自“形胜家”即风水先生之口，却浓缩着通海放洋的悠久传统，提示后人对广州与海洋文明的关系，必须给予高度的关注。

时至今日，在广州历史研究中，如何把“舶”字做深、做活、做大，似乎还是有待探讨的问题。蕃舶被洋舶所代替，与和平贸易变成商业战争有什么关系；唐宋时代的舶商与近代形成的“公班衙”，在贸易体制上差别何在；古代的舶牙与清代的行商各自形成什么样的“南海观”和“西洋观”；“舶来品”的经济内涵和文化内涵应当作何理解；登岸后的精神舶来品和物质舶来品有何不同的命运；西学东渐，广州首当其冲。“舶来”与“舶去”的互动关系究竟怎样；缺了一部《广州洋舶录》，载体无影无踪，海港岂不成了空港？如此等等，倘若没有不断地拓展史料，不断地深化论题，不断地改进方法，要想做好“舶”字这篇大文章，对“华夷估舶自成群”（魏源句）的广州作出中西会通的历史阐释，恐怕任何妙笔都是难以生花的。

为了推动“广州与海洋文明”的研究，市方志办不遗

余力，惠予立项，及时地组织了这套知识性丛书的编写工作。承担各个专题的执笔人，都是学有专长的后起之秀。限于体例，他们虽有厚积而只能薄发，化大力来写小书。难道这就英雄无用武之地？西方有句谚语颇能开人心窍："宁可做小的大作家，不要做大的小作家。"只要在大小之间确定理性取向，缩龙成寸，以小见大，就不会妄自菲薄了。我们要以卓越的史学前辈为榜样，新会陈援庵先生的名著《清初僧诤记》，气格那么高，学术含量那么大，篇幅却只有5万字，堪称"伟大的小书"。面对着潮水式的"泡沫学术"，让我们心明眼亮地取法乎上吧。

《广州与海洋文明系列》的出版，可说是群策群力、集腋成裘的一次学术协作。集腋之劳，分属执笔人；成裘之功，应归方志办。至于我自己，无非是一个吹鼓手的角色，虽应命撰序，其实奏不出什么雅韵高潮，只不过说几句想说的话而已。

2002年8月28日写于中山大学

目 录

第一章 从“叶落归根”到“落地生根”

——东南亚广府籍华侨的由来和变迁 …… 1

1 近代以前以海商、政治避难、求法僧等形式到东南亚的广府华侨 …… 3

2 近代以契约华工等形式的大规模出海 …… 9

3 民国时期广府华侨出国 …… 15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东南亚的广府华侨 …… 19

第二章 无远弗届与小广州

——东南亚广府华侨的分布与聚居 …… 25

1 广府华侨在越南 …… 26

2 广府华侨在柬埔寨 …… 33

3 广府华侨在老挝 …… 35

4 广府华侨在泰国 …… 37

5 广府华侨在缅甸 …… 41

6 广府华侨在菲律宾 …… 45
7 广府华侨在印尼 …… 48
8 广府华侨在马来西亚 …… 53
9 广府华侨在新加坡 …… 59
10 广府华侨在文莱 …… 63

第三章 从小商小贩到商业巨亨

——广府华侨在东南亚的职业与生活 …… 65
1 广府华侨在东南亚的职业 …… 66
2 东南亚华侨社会的广府文化 …… 78
3 广府华侨在东南亚的教育 …… 81

第四章 五缘社会的华侨组织

——广府华侨在东南亚的社团与组织 …… 89

第五章 赤子情怀与华南巨变

——东南亚华侨与广州的发展 …… 100

主要参考书目 …… 121

第一章

从“叶落归根”到“落地生根”

——东南亚广府籍华侨的由来和变迁

近代以前以海商、政治避难、求法僧等形式到东南亚的广府华侨

近代以契约华工等形式的大规模出海

民国时期广府华侨出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东南亚的广府华侨

广州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数千年来与海外联系不辍。广州地濒南海，对外交通便捷，历史上不乏人口的移入与移出。既有阿拉伯、波斯、占城等地侨民的聚居，也有不少广州人移民海外。侨居海外的中国人，近代多以方言结群，形成福建、客家、潮州、广府（广肇）、海南等群体。广州地区长期以来使用广州方言，俗称白话，又称粤语。讲粤语方言者主要分布在明清行政区划中的广州府和肇庆府，其中又以广州府为代表，所以侨居海外粤语方言族群被称为广府帮或广肇帮。历史上的广肇地区包括今广州、佛山、珠海、江门各市县及湛江、茂名、深圳、东莞、韶关、肇庆部分县区。此外，历史上由于人口迁移，在粤语方言区也生活有不少讲客家方言者，他们出国后都加入了客家帮，并不属于广肇帮。本书主要讨论的是历史上属于广肇帮的华侨。

移民海外的华侨，分布遍及全球，其中最重要的聚居地为东南亚，集中了海外华侨的 2/3 以上。广府华侨也不例外，东南亚是广府华侨最集中的地区。

1 近代以前以海商、政治避难、求法僧等形式到东南亚的广府华侨

广肇地区成为中国统一王朝的一部分是从秦朝开始的。前214年，秦始皇攻略百越，在岭南设置桂林、南海、象三郡。南海郡大约相当于今日的广东省。西汉淮南王刘安撰述的《淮南子》记载，秦始皇攻略百越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获得犀角、象牙、翡翠、珠玑等宝物。这类产品有很多自海外输来，先秦时期广东商人中应该也有跑外洋的，可能就有经常侨居国外者。到了汉朝，中国与海外的联系更加密切。《汉书》记载了汉代中国使节从华南沿海出外访问和通商的情况。他们的出发点是日南（今越南中部）、徐闻、合浦，最远到达印度南部。出海时，他们首先坐中国船只，到达第一个大港都元后，再乘“蛮夷贾船，转送致之”（班固：《汉书·地理志》）。当时华南沿海的中国船主要是越人船只，越人是今日不少广东人的祖先。越人是卓越的航海者，活跃于南中国海沿岸。东汉时，今越南中部的朱吾县民不堪当地官员的残暴，相约逃至屈都乾（即都元），就是因为当地常有中国越人商人和水手光顾。此后，屈都乾又聚集不少的中国人，成为汉代至魏晋时期东南亚最有名的

华侨聚居地，以致不了解东南亚情况的西方商人以为这是一个中国港口，他们说“喀提加拉(即屈都乾)是一个秦奈(中国，CHINA)港口”。屈都乾大约在今日泰国的东南部，当地的华侨以华南沿海的越人为主，其中不乏广肇地区的先民，可谓早期的广府华侨。

在唐代，有广州求法僧人移居东南亚。据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义净在印度求得大批梵文佛典后，在室利佛逝(今印尼苏门答腊岛东部)进行翻译和研究，不久，又回到广州招徕助手，僧人贞固、法朗、孟怀业、道弘随他到了室利佛逝。后来，法朗死于印尼，贞固和道弘随义净回国，孟怀业“恋居佛逝，不返番禺”(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重归南海传》)，定居在东南亚。

比较确切记载广府地区人民移居海外是在唐朝末年。唐末黄巢起义，879年起义军攻下广州，出现社会动乱，当时唐朝南方对外贸易中心是广州，有不少外籍侨民如阿拉伯、波斯商人聚居，不少广州人为躲避战乱，随外籍商人出逃海外。10世纪阿拉伯旅行家马素提在其著作《黄金牧地》中记载，在巨港(今印尼苏门答腊岛东部)一带有很多华人，据说是为了躲避黄巢起义从广州迁来的。他们是因政治和宗教原因移居海外的广府华侨。

有唐一代，虽然中国造船和航海技术已有一定水平，但在南海地区控制贸易的是阿拉伯和波斯商人，以

及一些东南亚商人，所以广州一带人民出海经商者还不是很多。到了宋代，由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西北“丝绸之路”衰落，海外贸易得到大大发展，加之中国造船技术提高，商人经济势力增强，不少海商经常出外经商。宋代人朱彧记载他在广州的见闻说：“北人过海外，足岁不还者，谓之住蕃。……广人举债息一倍，约舶过回偿。住蕃虽十年不归，息亦不增。”（朱彧：《萍州可谈》卷二）说明当时广州商人出海经商，经常多年不归，侨居国外。宋代还有记载说：“入蕃海商……或名为住冬，留在彼国数年不回，有二十年者，取妻生子。”（《宋会要辑稿·刑法二》）这些记载反映了当时广州地区人民侨居国外已不是个别现象。

宋代末年，广东尤其是珠江口一带是宋朝抵抗元军的最后据点，抗元失败后，不少当地人民随宋朝官兵逃往海外，他们主要逃往中南半岛各国的南中国海沿岸。如安南，在元初军队征安南时，就有宋朝人在安南军中共同打击元军。在今日越南中部，还有有关宋朝王公之妻赵娘子的传说。如占城（今越南中部的古国），宋末宰相陈宜中抗元失败后，首先逃至占城，后来又逃往暹罗（今泰国）。元代曾记载占城有不少华侨，占城人懂汉文化者很多，这都可能与宋末来自珠江口一带的大批移民有关。

元代末年，中国内乱，又有不少广府人移居东南亚。据历史记载，在苏门答腊的三佛齐国，明初“有梁

道明者，广东南海人，久居其国，闽粤军民泛海从之者数千家，推道明为首，雄视一方”（张燮：《东西洋考·旧港条》）。梁道明就是元末迁至印尼的广府华侨。在爪哇岛也有不少广东华侨，明初记载有杜板“此处约千余家，以二头目为主，其间多有广东及漳州人流居此地”。又如新村“原系沙滩之地，盖因中国之人来此创居，遂名新村，至今村主广东人也”（马欢：《瀛涯胜览·爪哇条》）。其中不乏广府移民。暹罗（泰国）也是元末移民聚居地。明初暹罗出使中国的使臣中，不少是华人，多是广东籍。

明初为保持政局的稳定，实行海禁政策，影响了华侨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许多移民海外的华侨不敢回国。为暹罗做使臣的华人许多改为泰人名字，不敢承认自己是华人。明代中期，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广东沿海与东南亚的走私贸易增多。贸易的发展迫使明政府开放海禁。16世纪中叶，隆庆皇帝解除海禁，允许商民出海贸易。广府地区移民形成新的高潮，出海者“十倍于昔”，侨居地包括当今东南亚各地，如越南兴安，近年发现的17世纪初华人赞助庙宇的碑文中，就有不少广府侨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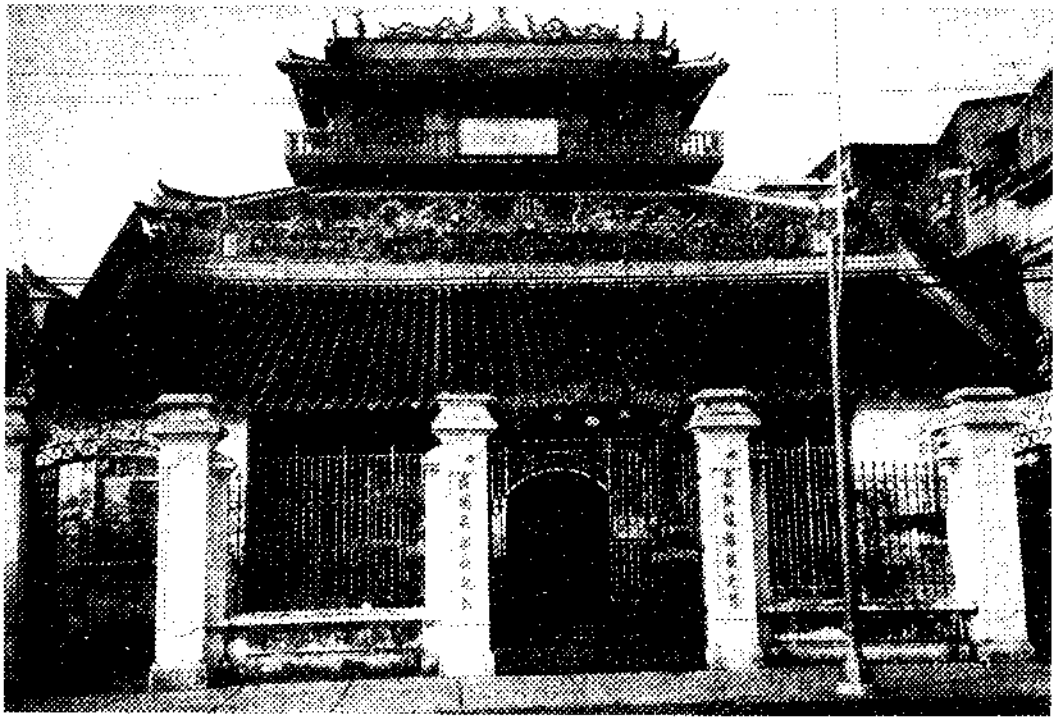
明末清初，国内改朝换代，战乱频仍。顺治十三年（1656），清政府为切断沿海地区同台湾郑成功集团的联系，实行禁海政策。顺治十八年（1661），又颁布“迁界令”，实行迁海政策，东南沿海居民从海岸向内地迁移

数十里。不少农民渔民流离失所，失去了维持生计的工具，被迫移民海外。当时广肇地区顺德、番禺、南海、香山(中山)、恩平、开平、新宁等地都在迁海之列。如康熙十年(1671)，海康县人莫玖，带领同乡数千人渡海到柬埔寨，柬国主任命其为芒坎屋牙(港主)。莫玖将该地易名河仙，积极发展当地经济和文化，成为东南亚著名的华侨聚居地。

莫玖与其子莫天赐治理河仙达百年之久，此后他们接受越南广南阮氏政权的保护，使河仙成为越南的一部分。大约同时，明朝高雷廉总兵陈上川和龙门总兵杨彦迪，率领所部反清将士，逃往越南广南政权，广南阮氏令其垦殖东浦地区(今越南胡志明市一带)。这部分讲粤语方言的移民集团，成为早期开发湄公河三角洲的主力队伍。

明末迁移越南南方广南政权的反清人士，为了维持“明朝香业”，结成明香社，当时在越南南方各地有不少明香社。陈上川等人也在广南政权同意下成立明香社。清朝掌握全国政权后，从中国再来的移民大都剃发结辫，就不能加入明香社，他们的聚居地被称为“清河铺”。随着时间推移，明香社的反清色彩越来越淡，明香也改为明乡，成为归籍华侨或中越混血儿的代称。

康熙二十二年(1683)，台湾统一，政局安定下来，清朝解除了海禁。此后随商船出海，或偷渡移民的广府人又开始增多，但清政府禁止移民海外，也不保护海外侨



以广府人后裔为主的明香人在西贡的明香会馆

民的利益。18世纪中叶以后移民东南亚的广府华侨更多。在马来亚，有很多广府人开矿和从事商业，在越南北部，也有不少广府人开矿，今日越南广宁省一带，还有不少越南居民是清朝开矿华人的后代。广府华侨不少已扎根当地，如1776年在越做药材生意的番禺人范光喜，娶安南女，后生二子。

近代以前东南亚广府移民有几个特点：一是人数还不是很多；二是政府在法律上还不允许侨居外国，政府也不保护侨民在海外的利益；三是社团组织还没有形成。

2 近代以契约华工等形式的大规模出海

西方殖民者来到东南亚后，当地的政治格局、经济格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广府地区移民到东南亚的也有了新的形式。近代以前，华侨移民东南亚主要是商人和政治避难者，西方殖民者东来后，不少广府人以佣工、契约工人的方式出海。出洋做工的广府人移居国外有四种形式：自寻出路与人定约、集体受招募、被拐卖作“猪仔”、亲戚朋友介绍等。

康熙年间开放海禁后，准许外国人在广州设立商馆，史称“十三夷馆”。西方国家商船经常来到广州，

广府地方不少人自愿到船上作舵工、水手、杂工等，这些工人中不少留居外国。随着早期出洋华工条件改善，不少地区形成连锁移民，跟随亲戚出洋做工。这样的出洋做工在近代华工中只占少数，占多数的是契约华工和猪仔华工。

契约华工最早出现于荷属东印度的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大约在17世纪初已开始出现，由于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式的生产要到工业革命以后才形成，所以19世纪之前，作为契约工人的华人并不多。

19世纪初，大多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完成工业革命，他们在殖民地加紧开发原材料，迫切需要大批廉价工人。

1800—182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通过驻广州的商馆，从黄埔和澳门多次偷运华工到马六甲海峡的槟榔屿和马六甲。据研究，从1805—1815年间，从澳门每年运到槟榔屿的契约华工约500～1500人，其中大多数是广府人。英国于1819年占据新加坡时，岛上的人口只有100多人，为了开发新加坡，殖民政府大力招募华人，19世纪30年代，每年运至新加坡的华工近1万人，其中有不少华工被转运至其他地区。由于当时华工出洋不合法，契约华工即使是自愿去也是被偷运出洋。通过自愿的原则招募不到足够的契约华工，殖民者又进行拐卖和掳掠等强盗式的猪仔华工贸易。19世纪初，英国殖民者就利用槟榔屿华人回国诱招华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



被拐骗或被贩卖的契约华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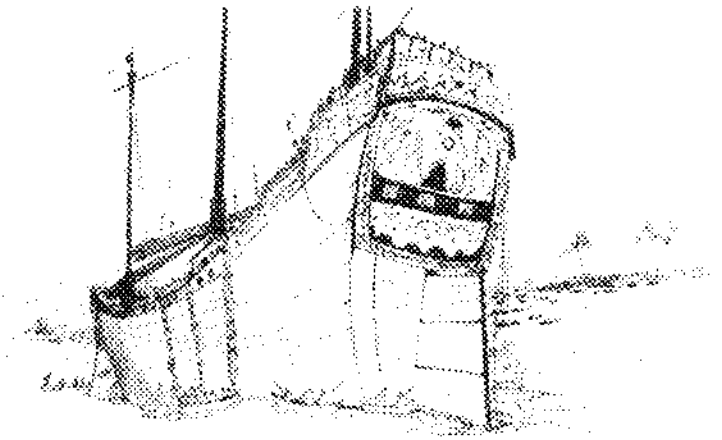
后，广州对外开放贸易，西方劳工贩子纷纷来到广州。他们勾结地痞流氓，把广州市民和邻近四乡的农民劫持上船，强迫他们签订卖身契约，贩运出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占领广州，更为人贩子打开了方便之门，拐卖华工最为猖獗。咸丰十年(1860)，广州地方官员报告说，广州男女被拐卖者达上万人。当时英国驻广州领事阿礼国也说："现在在广州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在离开自家门之后不冒被拐卖的危险。甚至在大白天，在大庭广众之下，也会有人被拐匪捏造谣言，或借索债之名被绑架而去。"据当时记载："道路劫夺者，直伺于僻径，待可欺者经过，即一人突出遮其口，数人强纳于麻袋，负之而径行。"又有"用迷脑药将人脑神经迷住一部分，令你糊糊涂涂跟着他走，直至船上，关在黑仓为止，然后，慢慢用解药灌醒，如鱼入釜中，任人烹宰"。《北京条约》签订后，华工出国成为合法，更多人贩子假借合法之名，行拐骗之实，这种"卖猪仔"的恶劣行径越演越猖獗，清政府被迫采取行动。1866—1871年清政府在广东就处死了81名拐匪，以后仍不断打击，但直到清末，这种"猪仔"买卖都没能禁绝。也有其他一些原因成为猪仔华工的，如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广府一带不少受牵连的人逃至港澳，生活无着，卖身为猪仔。19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山、五邑一带经常发生"土客之争"，械斗不断，械斗双方往往把俘虏押往澳门卖为猪仔。有些华侨出洋时并不是猪仔，到了东南亚之后

又被拐卖为猪仔，如清末人士李钟珏记载："华人来南洋做工者，抵(新加)坡，先投客馆。客馆者，奸商开设，即猪仔馆也。客或自备舟资稍有旅费者，不敢藐视，若迫于生计，仓促出洋，身无长物，一投客馆，则此身非己有矣，固不必被拐而来始落陷阱也。"(李钟珏：《新嘉坡风土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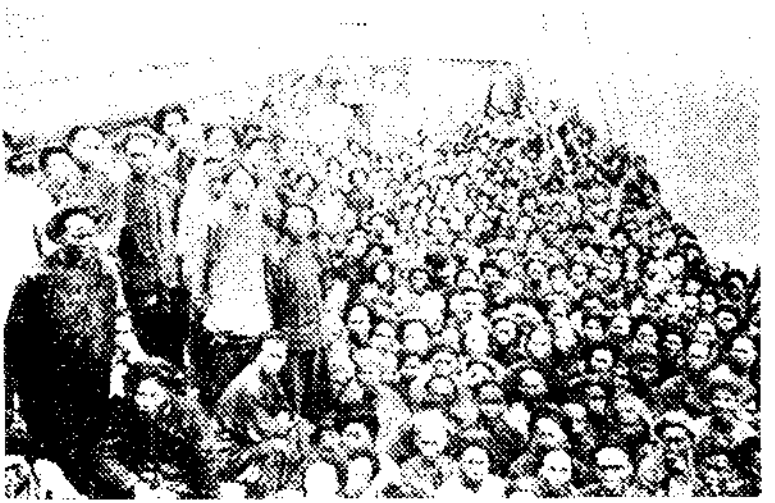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同意契约华工合法化，西方殖民者在广州设立了招工处所或以洋行为据点招工，除了被拐卖的"猪仔"外，也有人自愿成为契约华工，又被称为"苦力贸易"。这些契约华工，名义上是殖民者的雇员，实质如同奴隶，契约规定，服务期满即可成为自由身，实际上在契约期满后，仍因各种原因不能脱身，只有很少人能摆脱这种困境。据估计，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前后出洋的华工约有1000万人次，其中有一半以上是契约华工和猪仔华工，广府籍占总数的1/3以上。

除了出洋做工外，也有传统上的因经商和政治原因到达东南亚的广府华侨，如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今花都、白云区一带不少人逃往海外；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梁及其追随者不少成为东南亚新的广府籍华侨。

19世纪后期，清政府逐渐改变对海外侨民的态度，对海外华侨有了新的认识。一些对海外世界比较了解的有识之士，如李鸿章、张之洞、郑观应、薛福成、曾纪泽、丁日昌等，主张积极吸引华侨对祖国做贡献，设置



运“猪仔”的帆船



帆船上的华工

领事保护华侨等。从1877年开始，清政府开始在海外华侨聚居地设立领事馆，保护侨民。在经济上利用华侨是清朝华侨政策的中心，也是当时侨务活动的主要部分，清政府不断派人或令领事官员向侨民募捐、劝捐。一旦国内发生自然灾害，清政府总是发动华侨赈灾。为了激励华侨的爱国之心、民族热情，清北洋舰队先后多次到达东南亚。清政府还鼓励华侨为海防集资，帮助清政府购买船械等。海外华侨与清政府的密切联系成为华侨史的新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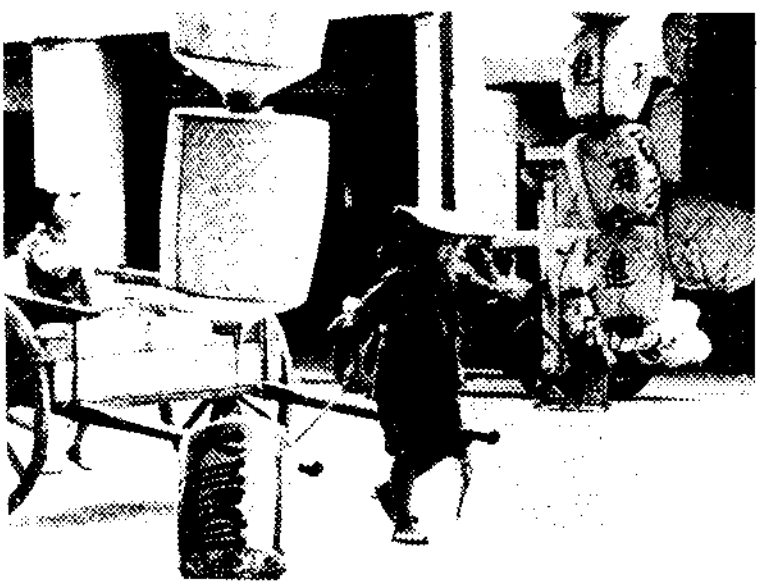


民国时期广府华侨出国

辛亥革命的成功，离不开海外华侨的积极支持。孙中山先生说："华侨是革命之母"。中华民国成立后，积极发展侨务工作，保护海外华侨。1912年，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发布杜绝贩卖猪仔华工的命令。北洋政府也成立侨工事务局。20世纪30年代，在沿海各地市设置了多个地方侨务局，1934年，广府地区的广州、江门设立了侨务局。

民国时期，从广府地区移往东南亚的华侨都是自由移民，其中有商人、工人、革命者，也有团聚的家人。这个时期的典型特点是妇女出国增多。如花县(今广州花

都区）赤坭有一批妇女到新加坡做工，他们多在建筑工地做临时工，头戴遮阳的蓝头巾，有“花县蓝头巾”之称。此外南海、三水等地也有此类情况，南海妇女也习惯戴蓝头巾，三水妇女则习惯戴红头巾。珠江三角洲的桑塘地区历来有女子不嫁，留家帮父母照顾家务，抚养弟妹的风俗。她们被尊称为姑婆，俗称自梳女。19世纪末，一批自梳女开始到东南亚做工，赚钱养家，她们主要做佣工。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爆发，珠三角一带的缫丝等纺织业遭到重创，纺织女工为了谋生，纷纷到广州、香港、东南亚各大城市寻找职业，尤以顺德女工最多，以致以后东南亚各地家庭佣工中，顺德人占了极大的比重。



三水红头巾

中国与华侨居住地关于华侨国籍的争议始于清末，发展和激烈斗争在中华民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基本解决。19世纪东南亚各地殖民政府基本上都确定了出生地主义的《国籍法》。清末，华侨在东南亚各地所生子女越来越多，1909年清政府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国籍法》，是以血统主义为原则。1911年，中华民国政府颁布《国籍法》，并于1914年和1929年两次修改，仍以血统主义原则为主，辅以出生地主义。清政府和中华民国《国籍法》的实施在东南亚地区造就了大批双重国籍者，主要是第二代及第三代侨生子女。正因为这种矛盾，所以在华侨人数统计上中国与当地政府调查数字常有很大差距，如民国时期，泰国政府历次人口调查的华侨数字，仅指第一代华侨，与中国方面关于华侨数字的估计常有数倍差距。中华民国政府时期，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强烈发展的时期，这是民国政府坚持血统主义《国籍法》的原因之一。因此，即使存在大量双重国籍问题，民国政府也未放弃血统主义《国籍法》。1949年，国民党政府败逃到台湾后，仍然坚持血统主义的“国籍法”，因此，在海外仍有不少既拿台湾护照又具有居住国国籍的“双重国籍”华侨。

在民国时期，迁往东南亚的广府华侨深受当地经济的影响，东南亚大部分地区在近代成为西方的殖民地，其经济被拉入世界经济体系，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环，东南亚主要是作为原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

近代在东南亚的华侨主要从事商业、矿业和在种植园做家业工人，这几个行业最容易受到世界经济大环境的影响。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使东南亚的所有地区受到了经济衰退的冲击。经济衰退导致商业衰落，种植园和矿厂生产的原料找不到销售的市场，引起了大批工商企业破产，就业机会减少。经济衰退导致大批华侨回国回乡谋生，民国时期东南亚的华侨人数始终呈上升趋势，1929—1933年是在民国时期惟一一段东南亚华侨人口减少的时期。

20世纪以后，东南亚各地殖民政府及中国政府都加强了对华侨的管理，因此也有了比较完整的华侨人口数据的统计。先看马来亚(今马来西亚西部)，1921年华侨总人口1171740人，其中广府籍331757人，占28.3%；1931年华侨总人口1704452人，其中广府籍417516人，占24.5%；1947年华侨总人口2614667人，其中广府籍641945人，占24.6%。泰国华侨以潮汕籍最多，占60%以上，广府籍约占10%，二战前约有25万人。印尼据1930年统计，华侨共有554981人，其中广府籍136130人，占24.5%。菲律宾华侨以福建籍最多，约占85%，广东籍(以广府的台山、开平居多)占12%。缅甸1931年统计华侨总数193504人，其中广东籍(包括广府和其他地区)33990人，占17%，二战以后的1946年，广东籍升至30%。印度支那(越南、柬埔寨、老挝为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1936年统计，广府人占华侨人数

50%。捞越北婆罗洲(今马来西亚东部)1931年统计，华侨总人口47972人，其中广府人12459人，占26.7%。文莱1931年华侨总人口2683人，其中广府人410人，占15.3%。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资本主义经济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加紧了对殖民地的掠夺和资本输出。东南亚大部分地区工商业得到长足发展。东南亚华侨经济也兴起了不少近代式的工商企业，尤其在一战后至1929年，更是东南亚华侨经济的“黄金时期”。由于经济的增长，使不少华侨有雄厚的资金投入家乡的各种建设，这段时期也是华侨投资广州的繁荣时期。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东南亚的广府华侨

新中国成立前后，东南亚各地经过不同的道路，先后获得独立。这些国家的独立伴随着其民族主义的兴起，这种政治形势导致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在战后有不同程度的限制华侨和排华的政策。中国政府注意到华侨的困难处境和生存发展的长远利益，顺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着手解决双重国籍问题。1955年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亚非会议上，正式宣布中国不主张双重国籍。中国政府对解决双重国籍的原则立场是：中国只承认一个国籍；

中国政府赞成和鼓励华侨按照自愿原则选择居住国国籍，凡是自愿加入或已经取得居住国国籍的人，不再是中国公民，成为外籍华人。对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中国政府要求他们遵守居住国法律，尊重当地的生活风俗习惯，不干涉当地政治。1955年，中国首先与印度尼西亚签订了解决双重国籍的条约，正是以上述原则为基础。1980年中国政府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对于华侨的双重国籍也是按上述原则来解决。由于战前殖民地时期，大多数东南亚的殖民政府均对华人实行两元政策，即在政治上扶植本地原住民，在经济上故意放任华侨华人的发展。因而战后初期，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独立时面临着本地人掌握政治，华人经济占优势的局面。东南亚各国政府均采取了不同程度限制华侨华人经济的政策，为了自身的生存利益，大部分华侨选择了所在国国籍。

大量的华侨参加所在国的国籍，使原来的华侨社会逐渐演变为华人社会。华侨华人对所在国和祖籍国的观念发生了变化。昔日“寄人篱下”，总希望有朝一日“落叶归根”，回归故乡的思想，改变为在心态上准备扎根当地，“落地生根”。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所在国的限制，东南亚各国基本没有华侨新移民，因此第二代、第三代的华裔，成为华人社会的主体。加上战后东南亚各国在教育上均限制了华文教育，压制了中华文化的传播，所以华人社会与祖籍国的联系越来越少，在政

治上认同了当地社会，真正地形成了“落地生根”。

东南亚各国在二战后大多政治不稳定，在一些国家发生了多次大规模的排华事件，导致不少华侨甚至已加入当地国籍的华人逃离该国，或是回到中国，或是逃往西方国家，其行程中的悲惨形状，为人类历史上之少见。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印尼国内政局动荡，经济萧条。在政治上，美帝支持下的军人势力打击印尼共产党势力，由于苏加诺总统与中国关系友好，华侨华人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五纵队”、印尼共产党的朋友，华人成了政治上被迫害的对象和经济不景气的替罪羊。大批华侨华人离开印尼前往中国，中国政府曾多次派船到印尼接回难侨。1960年，广州市成立了接待和安置归侨委员会。从1960年1月到1962年，广州口岸共接待印尼归难侨63299人，大部分被安排在广州附近华侨农场中工作。在这些印尼难侨中，不少人实际上已是印尼国籍。有些人甚至已是第几代移民，只会讲印尼话，不会讲中文，不会讲中国方言，很难在中国社会生存，他们被集中安排在某些华侨农场工作，并配备有专门替他们翻译的工作人员。由于语言交流不通，这些归侨大都终生未建立家庭，他们中的不少人至今仍生活在广州及珠三角或广东省其他地区的华侨农场中。在缅甸，50年代开始，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执政，实行国有化政策，主要从事私营经济的华侨华人不少逃离缅甸，逃往中国的主要是到云南、香港和澳门，只有较少缅甸华侨华人回到了广

州。70年代末，在越南掀起排华浪潮。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导致大批华侨华人逃离柬埔寨。同一时期，越南控制下的老挝也以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为名进行排华。从1977年至1986年这段时间，在印支三国掀起的排华浪潮中，约150万人逃离家园，其中不少人葬身鱼腹。有27万人回到中国，被广州和珠三角地区接纳的约有10万人。在几次排华浪潮中来到广州的归难侨，以安置在华侨农场为主要的工作安排，其中花县华侨农场收容了近3000名难侨，番禺的珠江华侨农场约有4000难侨，三水的迳口华侨农场约有3000名难侨等。

“落地生根”的东南亚华侨，取得当地国籍后，逐步改变了独立前只顾经济不顾政治的生存方式。新加坡是以华人为主的国家，1965年新加坡获得独立，李光耀出任总理，之后华人基本上主导了新加坡的政治。在马来西亚，华人也组织马华公会等政党，参加选举，参与政府管理。在泰国，华人华裔更积极地参与政治，泰历届政府的总理中近一半具有华人血统。在印尼，苏加诺和苏哈托政府时期都严格限制华人参政。1997年5月暴乱后，华人遭毒害的悲剧震惊了全世界，为了保护华人的合法权益，新的印尼政府鼓励华人积极参政，通过进入政府促进建立保护华人的政策，目前印尼也组织了华人政党，华人也开始进入政府内阁。

老一代华侨文化水平低，识字不多，靠出卖劳力为生者多，他们深知没有文化就没有更好的发展前途。加

上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所以新一代华人特别注重文化教育。在清朝末年，海外东南亚华侨就办有以各种方言讲课的书馆，广府华侨就办了不少以广州话为教学语言的中文学校。民国时期，东南亚各地的华文学校大都合并为中华学校，以普通话国语为教学语言。二战后，东南亚各独立国纷纷限制华文教育。泰国华文教育只能办到小学四年级，马来西亚华文只能办到中学，新加坡虽以华人为主，但英语为第一官方语言，只懂华文不懂英语的华人子弟，找份好的职业都很困难。20世纪50年代初期，不少华人子弟来国内读大学、或到大陆，或到台湾。六七十年代后，东南亚华人子弟留学目标以欧美为第一选择。由于华人子弟勤奋刻苦又聪明，不少华裔子弟学业成绩斐然。而在东南亚各国的不少大学里，华人教师占了很大的比例。

二战后，东南亚不少国家在政治上依靠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坚持反共立场，大多与社会主义中国关系不睦。在这样的背景下，东南亚各地华侨华人与中国大陆联系减少。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政策开放，积极吸引外资，东南亚华侨华人中有不少实力雄厚的企业集团，如泰国、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国内排名前十位的私人企业集团大部分为华人掌握，他们在拓展经营领域，开发新的投资地与市场时，首先会寻找文化相通、交流方便之地，改革开放后的大陆就成为他们重要的投资地

区。据统计，改革开放后，广东吸收的外资中，近80%来自港澳台同胞和东南亚华人，有力地促进了广东经济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

第二章

无远弗届与小广州

——东南亚广府华侨的分布与聚居

广府华侨在越南

广府华侨在柬埔寨

广府华侨在老挝

广府华侨在泰国

广府华侨在缅甸

广府华侨在菲律宾

广府华侨在印尼

广府华侨在马来西亚

广府华侨在新加坡

广府华侨在文莱

人们常用“无远弗届”一词形容华侨华人在世界上的广泛分布，其意是指没有什么远地方华侨到不了的，有人说，凡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侨。在东南亚的华侨既分布于大中城市，也分布于偏远的乡村，真正可以称得上是“无远弗届”。

1 广府华侨在越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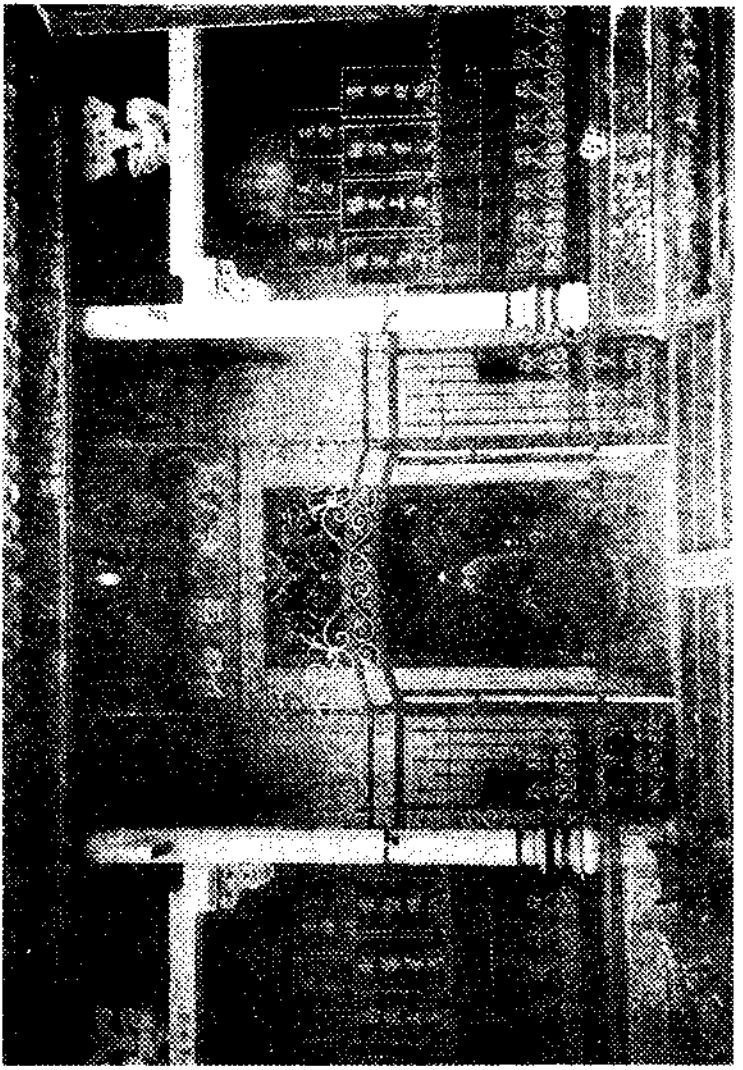
广府地区毗邻越南，从陆路海路都可以很方便地进入越南。广府人移民越南有很悠久的历史。越南北属时期，岭南人在越南的就很多，但当时不能算是华侨。10世纪越南自立后，才开始有了越南华侨史。在今越南中部，古代曾有占城国，从1世纪延续至17世纪，占城的华侨史也常被作为越南华侨史的一部分。越南毗邻中国，文化传承亦与中国相似，所以越南华侨史有一个重要特点是政治移民较多。中国的每一次王朝变更，几乎都有大批旧政权的拥护者南迁越南。宋朝灭亡、明朝灭亡时最为典型，这些南来的政治移民尤以广东一带为多，像明末的莫玖、陈上川、杨彦迪等都属于广府华侨。当然，前往越南经商的也不少，先后成为越南外贸中心的云屯、铺宪、会安、堤岸都是广府华侨很集中的地区。19世纪中期，越南成为法国的殖民地，法国逐步

把越南变成了重要的原材料产地，尤其将越南南部交趾支那地区改造为出口稻米的重要产地，当时西贡和曼谷、仰光并称为世界三大米市。交趾支那地区大米的经营与出口，主要就是依靠华侨商人。在其中，广府华侨在人数上、经营规模上都处于各帮华侨的首位，以至于当时广州话成为越南南方的重要商业用语。法国殖民政府对华侨有较多的限制，华侨入境，手续繁多，限制严格，以致许多华侨不愿到越南谋生，因此，相比于东南亚其他国家，近代越南华侨在人数上并没有显著的增长。二战后，越南分为南、北两个政府。北越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系友好，人员来往自由，但由于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中国的自由移民很少，相反倒有不少华侨回国。在南越，吴庭艳政府坚持反共立场，与台湾国民党政府关系密切，因此就不可能有大量的中国新移民。1975年越南南北统一后，越南政府走向了反华的道路。在国内，推行排华政策，大批华侨华人被迫远走他乡，华侨华人数日大量减少。如在20世纪50年代初，越南华侨华人约有150万人，此后还有人口增长，到了90年代，反而不到100万人。在50年代，南越政府就实行了强迫同化政策，70年代末统一后的越南政府也执行了类似的政策，80年代，为革新开放的需要，对华侨的政策相对较为宽松。

根据历代的统计数据，越南华侨华人人口数大约如下：1906年印度支那(包括越南、柬埔寨、老挝，但以越

南占绝大多数)有华侨 12 万人，1921 年越南有华侨 19.5 万人，1931 年 26.7 万人，1936 年 21.7 万人，二战前夕约 60 万人，1948 年约 70 万人。1951 年越南有华侨 74.9 万人，而中国统计为 150 万人。1989 年越南统计，全国华侨华人为 900200 人。1936 年殖民政府曾对华侨籍贯作了统计，其中广府人约占 50%，潮州、客家、海南占 28%，福建人 20%，其他省籍(以广西、云南为主)为 2%，广府人占一半，以后虽有一定的变动，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变。广府华侨在越南，居于城镇的多，居于乡村的少，居于城镇者以商业中心为主。

胡志明市：胡志明市由西贡、堤岸、嘉定三部分组成，它的形成就与华侨分不开。17 世纪后期，明朝余部陈上川、杨彦迪等不愿接受清朝统治，投往越南阮氏广南政权，广南政权令其拓殖东浦地区，陈上川等开发东浦地区，将荆棘莽丛之地，开发为鱼米之乡，在当地形成的商业中心中，先是农耐大铺，后以柴棍铺为最。柴棍铺成为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越南南方的商业中心，当时华侨华人占有该城人口半数以上。19 世纪中期，法国、西班牙侵略越南，先是夺取首都顺化附近的岘港，后来发现嘉定地区(今胡志明市一带)是更好的商业基地，就南下夺取嘉定，占领湄公河三角洲。法国人在嘉定镇(当时越南南方的政治中心)和柴棍铺之间修建一座新城，也称为柴棍，西文写作 Saigon，后被称作西贡，而柴棍铺后被华人称为堤岸，当地语 Cholon，即大市场之



19世纪晚期的广州

意。西贡逐渐成为法国在越南南方的殖民中心，堤岸则成为越南南方的经济中心，堤岸的华人占该市总人口的80%以上。西贡城也有不少华人。堤岸的前身柴棍铺就是陈上川等广府华人开辟的，所以堤岸的华人也以广府人为中心。在整个越南南方，华人操纵了中小商业，华人中又以广府人为最，广州话成了当地通用的商业用语，在堤岸城，广府人广州话都占了绝对优势，所以在近代史上，堤岸又被称为“小广州”。1932年，西贡、堤岸合成西堤联区。二战以后，西堤联区常被简称为西贡。20世纪50年代，吴庭艳政府开始强迫南越华人转入越南国籍，禁止华侨经营某些行业，华侨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将生意转到妻子或已取得越籍的子女身上等方法渡过难关，华人仍控制着西贡经济，1975年前夕华人仍控制西贡私营经济的八成以上。1975年越南全国统一，为纪念越南开国者胡志明主席，西贡改名胡志明市。70年代末，越南南方进行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并借机打击华侨华人，华侨被没收财产，不少人逃离越南，华人人口锐减。根据1985年国际组织的统计，海外越南难民约200万，其中一半是华人。1986年后，越南实行革新开放政策，90年代后，多种经济成分又发展起来，胡志明市重新成为越南的经济中心。在胡志明市，目前华人约有50万，主要居住在第五、六、十、十一郡，人口约占胡志明市的13%～15%，经济产值约占40%。由于文化与语言的关系，越南三大外资来源地香港、台湾、新加坡

的外商都乐意找当地华人作为合作对象，华人在越南经济中逐步恢复了旧有的地位，其中占一半的广府华人无疑是其中的中坚力量。



广州华侨华人在西贡的穗城会馆

海防：海防是越南第三大城市，第二大港和北方外贸中心。海防市形成于近代法国殖民统治时期，很快成为北方的外贸中心，吸引了不少越南华侨华人前来经商。越南革新开放后，海防成为北方的重点发展地区，吸引众多港台资金投资，华人数量呈上升趋势。目前该市约有5万华侨华人，广府人占60%。

会安：会安是越南中部传统的外贸中心。越南广南阮氏政权时代(16世纪末—18世纪末)，会安成为越南中南部外贸中心，成为当时华侨华人在越南最大的聚居地，当时城中已有福建会馆、广东会馆等，也是日本闭关锁国之前日本外商在东南亚的最大聚居地，商业贸易极为发达。随着西贡一带的发展，会安城中不少华侨华人迁至柴棍铺，西贡一堤岸的华侨商人中很多来自会安，说明会安铺有不少广府华侨。清初广州名僧大汕曾造访会安，其名著《海外纪事》曾描述会安城中有中华街，说明华人的聚居。法国殖民统治越南后，将西贡作为整个越南的商业中心，海防作为北方的外贸中心，会安附近的岘港成为中部的外贸中心，因为岘港具有比会安更优良的港口，19世纪末会安逐渐衰落，华侨商人大多迁至西贡一带，但今天的会安市仍有很多华裔，以福建、广府人为主。

广宁省：广宁省位于越南东北部，与中国广西区接壤，隔海与广东雷州半岛、海南省相望，自古以来就是广府华侨迁移的重点地区，越南史上第一个外贸中心云屯(云屯岛)就位于该省，著名旅游胜地下龙湾市(原名鸿基市)是其省会。由于地理上接近，又是早期越南外贸中心，明代以前该地就有不少广府华侨。明末，抗清失败的志士很多从广府一带逃至广宁省。清代广宁省一带开矿的华人以潮州、韶州(韶关)和广府为主。革新开放后，广宁省形成不少新的广府华侨，从广州及珠三角去

广宁省经商的新华侨很多。在广宁省的主要商业中心，下龙湾芒街等地汉语普通话和广州话基本可以通行。整个越南北方目前约有华人30万，其中广宁省占一半以上，广府籍占60%左右。

2 广府华侨在柬埔寨

有记载的柬埔寨华侨始于宋代。宋朝末年，因战乱出国到柬埔寨的中国人为数不少。元代时周达观访问柬埔寨时，曾说柬埔寨地利人和，“且米粮易求，妇女易得，屋室易办，器用易足，买卖易为”（周达观：《真腊风土记·流寓条》），不少中国人到当地谋生。近代时期，柬埔寨沦为法国殖民地，成为交趾支那殖民地的经济后方，不少华侨进入柬埔寨，19世纪末，柬华侨已达10万人。由于法殖民政府与中国国籍上的矛盾，所以中法之间的统计数字不一致。据法国人的统计，1921年柬埔寨有华侨9.1万人，1931年为14.8万人，1936年下降为10.6万人。20世纪40年代末，华侨人数激增，1949年柬埔寨华侨达42万，占柬总人口的10.8%。柬埔寨独立后，由于西哈努克政府与中国政府关系友好，所以不少华侨迁至柬埔寨，60年代末，华侨华人应该有近60万人。1970年朗诺发动政变后，限制华人经济的发展，但

没有大量排华。后来越南战争蔓延到柬埔寨，不少华人逃离。1975年，红色高棉建立民主柬埔寨政府，实行极端政策，提出不但要从经济上消灭资本主义，还要“从肉体上消灭资产阶级”。柬埔寨工商业的主体正是华侨华人，不少华人被迫害致死，许多人冒着生命危险逃离。1978年越南侵占柬埔寨，掀起反华排华的浪潮，大批华人难民逃往国外，经过几次冲击之后，80年代中期，柬埔寨的华侨华人只剩下10万人，华人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1986年越南革新开放，柬埔寨金边政权随之仿效，开始放松对华人的限制。90年代，柬埔寨问题和平解决，华人数量不断增加，华人经济也得到恢复。柬埔寨的华人以分布在城镇居多，如金边、马德望、干丹、磅湛、菠罗勉等。乡村居少，多从事工商业。从籍贯来看，潮汕人最多，广府次之。在近代史上，整个印支的经济中心是西贡，柬埔寨是西贡的后方，经济上受西贡控制。正如西贡贸易由广府华侨控制一样，柬埔寨的贸易也受广府华侨所控制，广州话也成为重要的商业用语，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今天。

金边：金边是柬埔寨的首都，柬埔寨的经济中心，是近代以来柬埔寨华侨的中心。19世纪中期，金边已有华侨五帮会(广府、潮州、客家、海南、福建)，金边的华侨始终占柬华侨人数的1/3左右。二战前夕，金边华侨华人约有10万，1949年有15万人，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战争的影响，不少柬埔寨华人涌向首都金边，

是金边华人历史上的最高峰，约有30万～50万。经过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的大规模下降后，金边华人约剩下5万人。80年代末，金边华人人口再呈上升趋势，据柬埔寨方面统计，1999年，进入柬埔寨的华人(包括中国籍的新华侨)约4万人，主要是到金边。1991年金边的华人有10万人，目前常住的约有15万人。在金边市，广府华人仍然占据了商业上的首要地位，在街上散步或购物，随时可听到广州话，正如一位中国学者近年的记载说："呆在金边，尤如置身在广东的某个地区，如果会讲粤语，那更是行动自由，方便极了。"从此可见广府华人在金边的势力。近年来，柬埔寨的经济受泰国影响越来越大，潮汕华人势力增大，金边更多受潮汕华人的影响。

3 广府华侨在老挝

华侨何时开始移入老挝难于调查，有史记载中国人最早移民老挝约在明朝初期。老挝大部分地区都是崇山峻岭，交通不便，人口稀少，商业机会少，所以华侨人数一直不多。由于老挝是内陆国家，老挝华侨的特点之一是，华侨多非一次移民，大都由越南、泰国和柬埔寨移入。一次移民主要来自云南，比较集中住在丰沙里等中老边境。法国殖民统治老挝后，华侨人数有所上升，

1921年法属印支政府统计华侨约7000人。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使华侨人口急剧减少，1931年、1936年两次人口调查，老挝华侨只有3000人。二战时期，从中国避难华侨增多，老挝华侨一度增至2万人左右。老挝华侨也分帮会，但与其他国家不同，分为广肇、云南、海南、客家和潮州五帮，华侨集中地以当地人数占优的一帮或两帮为主建立公所，其他各帮人依附之。从中可看出广府华侨在当地的分布。二战前，设有华侨帮会的有五个城市，万象、琅勃拉邦、巴色、他曲、川圹，其中他曲、川圹有广肇帮公所。

战后初期，老挝华侨减至几千人，20世纪50年代初达到1万人。1954年，法国撤出印支，华侨人数增加，60年代达5万人，70年代近10万人，其中3万人在首都万象，占万象人口1/3，万象华人以潮州人居多，但也有不少广府人。70年代后期开始，老挝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操纵老挝工商业的华侨不少人逃离老挝，1976年华侨人数为1.6万人，1978年为1.5万人，80年代中后期仅剩四五千人。老挝革新开放后，不少华侨华人回到老挝。目前，老挝华人约1万多人，其中首都万象6000人，老挝华人以潮州人最多，广府人居第二位。最近的趋势是，从云南来的新华侨从人数、经济实力上都开始改变老挝传统的华侨华人格局，云南华侨大有后来居上的发展势头。目前在老挝的广府籍华侨华人约有3000人，较多地集中在万象、川圹、他曲等城市。

4 广府华侨在泰国

在汉晋时期，今日泰国东南部一带已形成华侨聚居地——扈都乾，扈都乾的华侨中有不少越人，其中一部分来自广府地区。在扶南、真腊统治时期，也有不少华侨迁至今泰国地方。13世纪，一批泰族政权在今日泰北地区兴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素可泰政权，有人认为，素可泰就是中国史书中的暹国。宋代末年，丞相陈宜中等抗元不力逃入暹罗。在拉甘亨作暹王时，从中国聘请陶瓷技师，发展泰国陶瓷业，始有宋加洛瓷器，当时还有很多华侨商人在暹国经商。14世纪中期，泰国进入大城王朝时期，与明朝关系密切。明朝时，有不少华侨移民泰国。到了17世纪初，在一些泰国港口如北大年港，从事商贸活动的“华人流寓甚多，趾相踵也”。在首都阿瑜陀耶(即大城)，有五处华侨聚居地，其中最重要的是奶街。在17世纪时，整个泰国有华侨1万多人，京城阿瑜陀耶有3000～4000华人。当时泰国的制度是实行土地和人力控制相结合的萨迪纳制度，普通泰人被束缚在土地上，华侨就成为国王和封建贵族的贸易代理商。当时泰国人非常信任华人，对华侨在国内的商业贸易活动

基本没有限制，华侨基本上控制了泰国的国内贸易。因此，泰国华人分布十分广泛，大中城市，小城小镇，乃至偏远乡村，都有华侨商人存在，真正是无远弗届。18世纪中期，缅甸军队攻破阿瑜陀耶。华侨之子郑信率军光复泰国，建都吞武里，史称吞武里王朝。这段时期，是华侨移居泰国的重要时期。大量闽、粤(尤以潮州人为主，郑信父亲来自潮州)侨民来到泰国，在吞武里城对岸的曼谷地区逐渐开成一个新的华侨中心。18世纪末，泰国历史进入曼谷王朝时期。曼谷王朝前期十分尊重华人，华侨仍掌握了泰国的商业，新的华人移民陆续到来。据估计，1825年泰国约有华侨23万人，1860年约有33.7万人，1890年约47.9万人，1910年约有华侨79.2万人。19世纪末，泰国进行了朱拉隆功大帝改革，实行了许多西化的政策，泰国的民族主义开始兴起。20世纪初，中国辛亥革命和民族主义的发展对泰国触动很大。泰国开始了与中国争夺华侨华裔的泰民族主义措施。1913年泰国颁布《国籍法》，实行出生地主义原则。由于不能彻底开展同化原则，泰国开始限制新的华人移民，限制华文教育。1938年，銮披汶出任政府总理，实行强迫泰化措施。战后初期，泰国华侨社会活动有所恢复，形成新的移民高潮，1946—1948年，每年新增华侨新客5万多人。1947銮披汶再次上台，重新执行限制华侨政策。从50年代起，泰国华文教育日趋式微，绝大部分华裔的第一语言成为泰语，加上新移民很少，老华侨年龄渐

大，新生代华裔成为华人主力，因此，许多人认为，在泰国已不存在独立的华侨华人社会。

泰国的华侨华人人口有多少，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因为自从1913年泰国公布以出生地主义为原则的《国籍法》以后，泰国政府的统计与外界的估计一直有较大差距。从古代历史以来，泰国社会始终非常尊重华人，不少华侨在泰国娶妻生子。按1927年泰国的一次统计，泰国人口中泰人占73.8%，华侨占3.9%，混血泰人（以中泰混血儿为主，泰国史上不认可泰人妇女嫁给西方人和印度人，对华人则没有约束）占有17.4%，所以华人与混血泰人占20%左右。1937年泰国人口普查时总人口为14464105人，华侨为524062人。若按上述20%原则来计算，当有约250万人。按当时中华民国《国籍法》的血统主义原则，250万人都是华侨。延伸至目前，泰国华侨人数越来越少，因为老华侨不断去世，新华侨很少，华裔按泰国法律不算华侨。一般估计，泰国目前华侨约为25万人，而华裔华人约500万。泰国华人很好地融合进了泰民族，也受到泰人的尊重，没有一点歧视。90年代以来，泰国政府阁员有一半以上具有华人血统，历届总理几乎全是华裔，差猜春哈旺、川立派（汉名吕基文）、挽限、信拉巴阿差（汉名马德祥）和刚上任的总理他信都是华人。

在泰国华人中，潮州籍比例最大，约占60%，广府人约占10%。1877年，广府华人就在曼谷建立广肇帮

会，说明当时已有众多广府华侨。20世纪80年代末的调查认为，泰国广府籍华侨华人约有35万，主要集中在曼谷，其他府镇也不少，如1988年，在董里府就新建了花县会馆。

曼谷：曼谷是泰国首都，位于湄南河下游，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亦是泰国最大的港口城市。曼谷城市的发展与华人分不开。吞武里王朝时，吞武里城对面的曼谷成为新的华侨商业中心。1782年曼谷王朝建立，把都城从吞武里迁到曼谷，在华侨聚居地柴珍建立皇宫，招聘了不少华人技师协助建设新都。为了方便华侨商业，曼谷王朝在三聘开设商业市场，称为三聘街。随着华侨商业的发展，三聘街延伸建立嵩越路。嵩越路成为华侨出入口商的集中地。二战前，三聘街和嵩越路是整个泰国的商贸枢纽。19世纪中期，在曼谷西方人集中地附近修建古龙军路，不久，石龙军路也成为华侨商业中心。介于石龙军路和三聘街之间的耀华力路的建设颇有前瞻性。建立于20世纪初的耀华力路路宽20米，发展前景广阔。二战前后，耀华力路成为曼谷商业中心，成为新的华人商业中心。因此，有人说曼谷的唐人街就是“一街三路”——三聘街、嵩越路、石龙军路、耀华力路。曼谷市的华人究竟有多少，谁也说不清楚。从每年华历春节整个曼谷几乎无一家商店营业，满街寂静的气氛可以看出一斑。有人说，如果曼谷市具有华人血统的人口都搬走，那么整个曼谷市就只剩下皇宫和几条河

流。曼谷的广府华侨早期居于三聘街，后以石龙军路为中心，广肇会馆就建于此，在曼谷新的商业中心耀华力路也有不少广府人，如以广府人为主的广东银行总行就设在耀华力路。曼谷市著名云氏家族是广府人，其祖墓就在广州市沙河区。

5 广府华侨在缅甸

缅甸华侨有个典型的特点，即缅北华侨主要来自云南，经陆路而来，缅南华侨主要来自闽、粤，从海路而来。中缅交流可以追溯到很远的历史。从明清时期，缅甸已经有不少的华侨。早期缅甸华侨以陆路到达的居多，既有经济的因素，也有政治的因素，如南明桂王永历余部，史称桂家。从海路而来的，以经商为主。19世纪中期，缅南中心仰光已经有唐人街。中国帆船经常停靠仰光，并受到缅甸政府的优待。去仰光的中国帆船以粤、闽商人为多，粤商的船只大都冠有“广”字，闽商的船只大多冠有“金”字。英国人占领缅甸后，从海路进入缅甸的华侨很多，一方面，英国在缅甸的开发需要大批劳力，英国侵缅期间，需要大批城建、营房、运输等方面的工人，从广东和海峡殖民地招聘了很多广府木工，以来自台山四邑的居多。商贸繁荣促进了更多的商

业机会；另一方面，移民到英国殖民地非常容易，没有多少限制，不像法国殖民控制下的印支那么严格。从英国统治的马来亚、海峡殖民地去缅甸根本不需用签证。根据缅甸的统计，1891 年全缅有华侨 3.7 万人，1911 年为 12.2 万，1921 年为 14.9 万，1931 年为 19.4 万，1941 年为 30 万。来自海路的闽、粤商人于 1908 年创立中华总商会，1912 年又成立华侨兴商总会，表明华侨社会到达一个高的阶段。二战时期，中国远征军曾赴缅作战，期间给缅甸华侨社会以强烈的刺激，华侨的爱国心自信心骤增，华文教育非常繁荣。战后初期，缅甸政府相对控制了失控的缅北华人移民，使华侨进入一个相对有序的发展时期，华人在经济方面得到稳定发展。1948 年缅甸独立，经过几年混乱局势后，缅甸社会在 1954 年以后趋于安定，经济繁荣，成为东南亚地区数一数二的富国，华人的商业也欣欣向荣。20 世纪 60 年代，奈温领导的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通过国有化措施发展民族经济，华人经济遭到重创，华文教育受到严格限制。80 年代末，面对周边国家经济的繁荣，经济衰疲的缅甸国民日益不满奈温及社会主义纲领党的执政。1988 年，缅甸国家恢复法律与秩序委员会政府上台，对毗邻国家实行全方位开放，在国内放宽了私人经济的发展空间。90 年代以来，由于中缅边贸的发展，缅北云南籍华侨华人的经济势力大大增强，而由于新加坡的大力投资，仰光等地的闽、粤华侨私营经济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有人认为："日

前缅甸华人经济占缅国内私营经济的六至七成以上。”在缅甸的广府华侨主要集中在缅南的仰光一带，早期缅南华侨以广府人为主，20世纪以后，闽侨数量超过粤侨。据1931年的调查统计，全缅华侨中云南籍占34%，福建籍25%，广东（以广府为主）占21%；在缅南伊洛瓦底江三角洲（仰光一带）闽侨占55%、广东人占35%；在缅中闽侨占35%，粤侨占30%，云南籍占25%；缅北，云南籍占60%，粤侨占20%，闽侨占10%。以后虽有一定的发展变化，但基本维持这种格局。1994年缅甸华侨登记为57785人，大部分是缅北土生华人，实际上缅甸华人约有100万，95%以上为缅籍，已经落地生根，其中原籍广府的华人超过20万。

仰光：1755年，缅甸缅籍牙王朝将孟人的达贡改名为漾贡，即仰光，以后逐步发展成为缅南的中心。18世纪后期，仰光便有不少闽、粤华侨。据英国人的记载，18世纪末，仰光河边两个大码头，一是缅王码头，一是中国码头。1824年英国占领仰光前，广府华侨已有很多，当时仰光城内有广东大街，1823年在仰光修建了广东观音古庙，内设有管理本庙和坟场的信托机构。属于洪门的广府人组织——义兴公司于1852年在仰光建立。1888年，仰光的广东华侨组织“广东公司”，由仰光广东宗亲团体和广东各专业社团各选出一名代表组成最高机构。英国人占领仰光后，对仰光的城市建设进行新规划，建设了第一到第六十四条宽阔的大街，第十四街到

第二十四街是华侨集中的地区，俗称唐人坡。唐人坡一部分为粤侨集中地，人们仍习惯称为广东大街。早期仰光，以广东华侨占多数，19世纪末开始，闽侨数量逐渐超过粤侨。在仰光的广府华侨，以经商者为多，但也有不少专业人士，如英国侵缅时期，曾从广东和海峡殖民地招聘了不少广府木工、泥水匠、刻石工及其他工匠，完成工作后大都留居仰光一带。19世纪末，广府华侨在仰光办了不少侨校，最初是在观音古庙设私塾，后来又办了新式学校。据英国人1891年统计，缅甸华侨3.7万人，半数来自海路，其中闽、粤各占一半，广府人约有9000人，主要集中在仰光一带。1911年缅甸华侨约12.2万人，其中粤侨(以广府为主)占21%，约2.5万人。二战之前，缅甸仰光的广府华侨已有很强的经济势力。战后初期至60年代，华侨经济仍稳步发展。50年代，仰光华侨有7万多人，其中广府人约3万人。60年代后，缅甸实行国有化措施，不少华侨资产被没收，仰光市华侨商业区大多被改为国营商场，华侨经济一落千丈。80年代末，缅甸经济改革，允许私有经济发展，华侨华人经济重新崛起，成为仰光市经济发展的生力军，目前，仰光市华人约有10万人，其中广府籍约3.5万人，以经营商业和进出口为主。

曼德勒：曼德勒是缅甸古都，又称瓦城、阿瓦，是缅甸中部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如果说缅南华侨以闽、粤籍为主，云南籍较少，缅北以云南籍为主，闽、

粤籍罕见，那么缅中的曼德勒正好处在一个过渡地带，闽、粤籍与滇籍不相上下，几乎三分天下，目前，曼德勒约有华侨华人8万人，其中广府人约有2.5万人。

6 广府华侨在菲律宾

在古代中国南洋交通史上，航线分为东西两条，以西线为主。东线一般以福建为出发点，可达菲律宾和印尼东部。正因为如此，菲律宾的华侨华人以福建籍占大多数，约占总额的85%，尤以闽南籍居多，所以在菲华人社会中，闽南语通行，即使粤籍华侨，也多习闽南语。明代中期，西班牙殖民侵略菲律宾，大部分菲领土沦为西班牙殖民地。自西占菲后，华商数量大幅度增加。17世纪初，马尼拉的八连市场(又译巴里昂，帕利安)已有3万华侨。西班牙殖民者通过从美洲带来的墨西哥银元与华商交易，使墨西哥“鹰洋”大量输入中国，成为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的独特景象。除了商人以外，中国大批木工、泥工、铁工纷纷来菲谋生。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建造横跨太平洋的马尼拉大帆船。主要依靠华人木工。随着华侨人数的激增和聚居，引起了殖民统治者的不安，于是限制华侨人数，压制华侨社会的发展，但效果并不明显。17世纪，由于种种突发原因，菲律宾的西

班牙殖民者发动了四次大规模屠杀华侨的事件。当时的明清政府并未做出任何保护华侨的措施。但随后华侨社会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与繁荣。18世纪中期，华侨再次遭到大规模屠杀，并被加以严格管制。从此时期至19世纪中期，是菲律宾华侨社会的低潮，近100年内，华侨总人数未超过1万人。西班牙殖民统治后期，对华侨的管制虽有放松，华侨人数有所增加，但始终未能恢复18世纪前的繁荣。1898年，美国取代西班牙成为菲律宾的统治者。美治菲律宾时期，政策相对开放和宽松，中国在菲设立领事馆，华侨人数也增至几十万人，经济势力也非常可观。二战后初期，菲律宾独立，经济民族主义抬头，菲律宾政府限制华侨工商业经营，以发展民族经济，不少华侨入籍，成为菲籍华人，华侨经济也转为当地民族经济。菲律宾华侨华人到底有多少，有不同的统计数字。现在一般认为，能讲汉语或汉语方言，具有华人的某些特殊特征者，被认为是华人，如果没有这些特征，在文化教育上已完全同化于土生菲律宾人者不被认为是华人。以此为根据统计，菲律宾目前有华侨华人约110万、具有中国国籍者(包括台湾护照)约50万人，完全倾向华人传统、并倾向让子女仍保持这种传统者，约60万～80万人。菲律宾的华侨华人以居住在马尼拉的居多，占一半以上，此外宿务市也有近5万人。散居各地的以吕宋岛、米沙鄢群岛、棉兰老岛为主。而如果计算有华人血统者，则菲律宾1/5的人具有华人血统，即超

过1000万人。在目前所认可的110万菲律宾华人中，约85%是福建籍，10%～12%是广东籍，广东籍以广府人占绝大多数，主要来自五邑地区。

马尼拉：今天所讲的马尼拉，一般指大马尼拉地区，包括马尼拉市、奎松市及其市郊，在菲律宾110万华侨华人中，约60%居住在大马尼拉。大马尼拉是菲律宾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马尼拉的华侨很早就有了规模，16世纪后期，已有1万人，17世纪初，达到3万多人。西班牙殖民者在马尼拉市建立八连市场供华侨集中居住和经商。八连市场成为马尼拉市的主要商业区，日常用品的供应者。八连居住的华侨除商人外，还有各种熟练的技工、医生等。八连市场是19世纪中期前马尼拉繁荣的重要经济支柱。19世纪中期以后，西班牙殖民者放松了对华侨的人身管制和经济管制，华侨在马尼拉的商业活动四散开来，但华侨的居住仍相对集中。现在马尼拉的华人区位于岷仑洛区，是海外最大的唐人街，纵横数百条街道，面积达9平方公里，华侨华人华裔近百万。除此地之外，大桥头、黎刹大街也有华人住宅和商店。在岷仑洛区唐人街，以王彬街、知彬街、后街仔、洲仔岸四条为主要大道。唐人街内中文招牌林立，中华文化浓厚，菲律宾将之作为重要的旅游景点，并树立有广告标语：凡到东方来观光的游客，只须到马尼拉华人区一游，便不必到中国去了。

在菲律宾的广府华侨大多居住在大马尼拉，约占总

数的 80%，近 10 万人，以经营商业为主，也有不少技术人员，大多在美国殖民统治时期到来。与美国早期华侨一样，菲律宾的广府华侨也以江门五邑人为主。

7 广府华侨在印尼

印尼与中国的交往在汉代已经开始，晋代时名僧法显也曾至爪哇。唐朝末年，证明已有华侨在印尼安居。宋元时期，海外贸易发达，商人出海者众多，“住蕃压冬”之说自此始。明代初期，在苏门答腊岛东部已有广府华侨的聚居地，说明广府华侨在印尼已有相当规模。17 世纪荷兰殖民统治印尼之前，全印尼约有华侨 1 万人，主要分布在苏门答腊东部和爪哇岛。荷兰殖民统治印尼后，华侨数量上有快速增长。明末清初国内动乱，移民海外的人不少到了印尼，据 18 世纪初的调查，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有华侨 6 万人，加上其他地区的华侨，整个印尼华侨在 18 世纪初已超过 10 万人，也有人说约有 20 万人。1850 年时爪哇岛有华侨 15 万人，1900 年增为 27 万人，散居在各外岛约 25 万。19 世纪末开始，荷印在中国招募农业工人，主要从香港和汕头招工，1888—1931 年，被招的猪仔华工约 35.5 万名，此外在邦加岛、勿里洞岛等矿厂也有十数万华工。1920 年，荷属东印度约有

华侨 81 万人，其中爪哇及马都拉岛约 38 万人，苏门答腊 30 万人，加里曼丹岛 8.3 万人，苏拉威西群岛 2.3 万人，摩鹿加群岛 4000 人，巴厘帝汶等岛共 1 万人。根据荷印殖民政府 1930 年统计，广府华侨占印尼华侨 11%～12%，广府华侨以鸦片战争后契约华工的形式大量进入印尼，主要分布在种植园、矿厂等，也有以经商或其他方式进入者。1920 年印尼的广府华侨约有 15 万人。二战前，印尼华侨增长极快，战前近 200 万人，广府华侨约 20 万。1950 年估计印尼华侨华人约 210 万，保留中国国籍者约 110 万。战后印尼有不少新客华侨，华侨人数仍有增长。1965 年印尼有华侨华人 350 万，加入印尼籍者 230 多万，华侨 113 万。1955 年中印(尼)签订解决华侨双重国籍的协定。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印尼掀起大规模排华运动。不少华侨华人逃回国内，单从广州口岸就有 6 万多难侨归国，还不包括许多自行回国的印尼归侨。苏哈托政府初期，单方面撕毁中印(尼)双重国籍协定，宣布大量华人入籍无效，又有不少华侨被迫归国。苏哈托政府还实施了大量强迫同化的政策，要求华人改名改姓，禁止使用华语等。苏哈托政府下台前后，印尼爆发了令世界震惊的反华暴动，华人再次成为印尼社会动乱的替罪羊，华人社会认识到必须通过参政、立法等手段维护华人的利益。目前，印尼华人组织了多个政党，积极参加选举，力图通过政府行为切实保护华人的正当权益。印尼是东南亚第一大国，也是东南亚华侨华



印度尼西亚某华人聚居区

人最多的国家，据估计，目前印尼有华人700万，广府籍占10%多一点，近100万。印尼华人由于长期政治上受压制，与中国国内的联系相对较少，不如新、马、泰等国华人为国人瞩目。印尼有一些华人比较集中的城市，如雅加达、泗水、万隆等。

雅加达：1619年荷兰殖民者占领雅加达，将它改名为巴达维亚，开始成为荷兰在印尼统治的中心。1619年底，巴达维亚市区有华侨300余人，1628年华侨增至3000多人。早期华侨至巴达维亚，一部分是商人，一部分是荷兰强盗在中国沿海劫掠商船时的俘虏，将他们作为奴隶在巴达维亚使用。1658年巴达维亚市区华侨已达5363人。清朝迁海期间，巴达维亚华侨人口有所减少。清朝开放海禁后，巴达维亚华侨又有所增加，至1740年红溪惨案爆发前，巴达维亚华侨有1.5万人。1740年红溪惨案使上万华侨失去了生命。此后，华侨人数又逐步恢复。1800年左右恢复到近2万人，鸦片战争后，大批华工出国，巴城华侨人口进一步增加。1920年巴城华侨约4万人，1930年超过7万人。荷属东印度殖民政府实行出生地主义的《国籍法》，将土生华人作为印尼国籍，不算作华侨。据另一种统计，1920年，巴城有华侨华人11万，占巴城总人口30万的1/3。从2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华侨华人始终占巴城(印尼独立后改称雅加达)的1/3左右。1940年巴达维亚人口100万，华侨华人有30多万，1965左右雅加达人口近400万，华侨华人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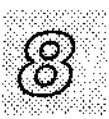
过 100 万。目前，雅加达及其郊区有人口 800 万，其中华侨华人约 80 万（如果全部算上有华人血统的，有人说雅加达近一半人是华人），其中广府籍约有 15 万。广府人在印尼从事工业生产者较多。

泗水：又称苏腊巴亚，是印尼第二大城市，也是华侨华人数仅次于雅加达的第二多城市。1920 年，泗水有华人 2.2 万余人，约是当时泗水人口的一半，1930 年，泗水有华侨华人近 4 万人。实际上，华侨早在 17 世纪就活跃于泗水。泗水本是东爪哇的主要贸易港，在满者伯夷时代就成为东爪哇的经济中心，荷兰殖民者将其拓殖为在印尼的最大海军基地，并把其作为爪哇东部和印尼东部诸岛的商品集散中心，吸引了大批华侨商人的聚居。由于华侨很早就到了泗水，所以该地有较多的土生华人，从法律和文化的多个层面上，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失去了华人的特征。目前泗水人口约 250 万，华侨华人近 20 万，如果从血统上看，绝不止此数。泗水广府人约有 3 万左右，以经营商业为主。泗水设有广肇会馆。

三宝垄：三宝垄是中爪哇省的省会，印尼第三大港。三宝垄是华侨较早定居印尼的地区，是华侨在爪哇的最早聚居地。据说，在唐末的时候，已有中国人前来定居。三宝垄是一个中国化的名字，三宝指一保太监郑和，郑和下西洋时，船队多次来到三宝垄，其随从因各种原因居留于此者很多。三宝垄有著名的三保庙或称三保洞。1920 年三宝垄有华侨 2 万人，1930 年有 3 万人。

目前三宝垄有华侨华人近 10 万人，占全市人口的 1/10。广府人在此多经营五金行业。

巨港：巨港是印尼古都，苏门答腊经济中心，印尼最大的石油基地。历史上，就有不少华侨迁居于此，多数都被同化。明初广府人梁道明就成为当地的华侨领袖。19 世纪后期，巨港被辟为石油产地后，又有大批华侨前来。1920 年，巨港有华侨 1 万人，1930 年有 1.5 万人。目前巨港有人口 60 万。其中华侨华人约 5 万。巨港的唐人街是 17 号街，布满华人商店和餐馆。巨港有不少广府人，建有广肇会馆，广府人以经营商业和餐馆为主，也有不少在油田工作。



广府华侨在马来西亚

马来半岛自古以来是东西方交通要冲，中国人迁居于此时间很早。隋唐以后，马来亚地区的华侨华人应有相当数目。明朝初年，郑和下西洋时，以马六甲为中转之地，使华侨移居马来亚形成一个新的高潮。16 世纪初，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时，当地已有不少华侨。以后荷兰、英国相继占有马六甲，华侨人数有增无减，1825 年英国自荷兰手中取得马六甲时，当地有华侨千余人。随着英国对海峡地区的占领和对马来亚地区的开发，马

来亚的华侨人数剧增，马六甲一地1834年有华侨4000余人，1842年增至近7000人，1852年超过1万人。1786年，英国从苏丹手中租得槟榔屿岛，将其作为在海峡地区发展的中心。两年后，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聚居有1.2万人口，其中华侨占40%，约5000人。1818年槟城有华侨近8000人，1860年近3万人。1800年英国从苏丹手中租得槟岛对岸的威尔斯利，与槟榔屿合为一行政区。威尔斯利开发之初，华侨甚少，1818年仅325人，此后人数迅速增加，1860年有8200多人。在马六甲、槟榔屿的华侨大多从事商业和各种手工业。在马来半岛内地，则有众多华侨从事锡矿开采，尤以广东广府籍和客家籍为多。在马来亚的森美兰、雪兰莪、彭亨与霹雳，富藏锡矿，华侨习惯称四地为四州府。在英国本殖民统治此地之前，已有众多开发锡矿的华侨，如1871年森美兰有华侨矿工1.2万人，霹雳州有华侨矿工5万人。霹雳矿工分为两大帮会，广府人组织义兴天地会。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来半岛各地沦为英国殖民地，英资势力进入锡矿业，并带来先进的机械技术，因此，虽然锡矿产量大为增加，但矿工数量增长不多，1930年英殖民政府统计，马来亚华侨矿工有8.3余人。

在东马，根据中国史籍记载，华人来到沙捞越中在1000多年前，但到19世纪初期，华人还不是很多。1850年，沙捞越的华侨约有3000人。19世纪中期只有很少广府人在沙捞越，他们主要集中在古晋地区。19世纪后

期，开始有较多广府移民。19世纪前期，沙巴的华侨也很少。1822年，一批从香港来的广府技工来到山打根，由于不习惯当地的生活条件，不久离开。此后又从香港来了一批客家移民，但人数不多。20世纪初，随着沙巴地区的开发，较多华侨迁居到此。1901年，沙巴有华侨1.2万余人，1911年有2.7万余人，1931年超过5万人，占当地总人口近1/5。战后初期，马来亚获得自治，1957年马来亚独立，1963年组织马来西亚联合邦。1957年，马来亚西马地区华人共233万，1970年西马华人328万，1980年386万。在东马，1960年沙捞越有23万华人，1970年29万，1980年38.5万。沙巴1960年华人10万，1970年14万，1980年16万。由于人口增长速度较马来人慢，所以华人在马来西亚的比重越来越低。1953年华人占马来亚人口44%，超过马来人43%，1970年华人占马来西亚人口的35.8%，1980年华人占马来西亚人口的33.8%。马来西亚1998年人口2200万，其中华人551万，占24.9%，是继新加坡之后，华侨华人占当地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马来西亚的华人大多居住在城镇，占马来西亚城镇人口的半数以上，所以马来西亚的大部分城市并无特殊的唐人街区，城市本身就以华人为主。在西马华人中，广府人大约占20%，目前约有100万；在东马，广府人约占10%，目前约有6万。

吉隆坡：吉隆坡是马来西亚首都，马来西亚最大城市，人口约近150万，其中华人约一半。华人遍布吉隆坡

全城，无所谓单独的唐人街，但其老城区仍被称为“中国城”。19世纪中期，吉隆坡仍为荒芜之地，华侨在此发现锡矿，并大规模开采，才使之成为重要地区。为发展锡矿产业，华侨将吉隆坡开辟为交通枢纽，1880年取代巴里港成为雪兰莪的首府。早期开发吉隆坡的主要是客家籍和广府籍华侨。19世纪后期，吉隆坡已建有广肇帮会。在吉隆坡有著名的陈氏书院，是广府陈氏仿照广州陈家祠而建，其建筑所用材料全部来自广州，工匠也从广府招请，至今仍是吉隆坡重要文化遗迹，表现了广府人在吉隆坡历史上的地位。在吉隆坡的老城区，也表现了如其他地区唐人街的特点，街道两旁商店有不少的中国特色商品，茶楼、饭店一如中国，也有类似广州花市的花店街，体现了广府文化的影响。在吉隆坡的华人中，广府人约占1/3。

槟榔屿：槟榔屿市，又称乔治市，在槟榔屿岛上，俗称槟城。槟城是马来西亚第二大城市，人口约60万人，其中华人占80%，1786年英国占领槟榔屿，从中国或马六甲招募华工大量开发建设，从此后华人一直是当地的主要居民。槟城以闽南人最有优势，但广府人也有不小的势力。1800年，槟城华人建立广福宫，创立当时，表明广府人和闽南人的力量均衡。光绪年间，槟城华人又建立平章公馆，仍是广府人和闽南人共同组建，当时广府人士以黄、胡、许、朱、伍、周等为大姓。1799年，槟城还由广府人建立洪门帮会支会义兴公司，都说明

早期槟城华人中广府人的极大势力。目前槟城华人中广府华人约占1/3，占整个槟城人口1/4，约15万左右。



中山市侨联出访马来西亚，拜访槟城香山会馆

马六甲：马六甲是马来西亚的古都，明代时就有不少华侨，尤其郑和下西洋时期是马六甲王国与中国关系最密切的时期，有不少华侨在当地经商和侨居。马六甲王国专门设有负责管理中国商人和商船的官员。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后，华侨来者减少。清初郑成功余部有逃来此地者。19世纪中期以前，马六甲华侨形成一个独特的社群——巴巴华人。英国人开发殖民马来半岛时，一批与锡矿、橡胶等产业有关的新华侨来到马六甲，马六甲焕发新的生机。在巴巴华人中，以祖籍为福建者居绝大多数。19世纪以后的华侨中，则有很多广府人。目前马

六甲市人口 28 万，其中华人超过 20 万。大部分巴巴华人又被重新“华化”，马六甲巴巴华人约剩 7000 余人。马六甲广府籍华人约 3 万～5 万。

怡保：怡保是霹雳州首府，号称“锡都”，是全国第三大城市，人口 40 万，以华人为主。在早期开发霹雳地区的锡矿华工中，以广府籍华工最多，客家籍次之。英国殖民马来半岛之前，霹雳锡矿华工已超过 5 万人。英国人到来之初，锡矿华工曾有较大发展，人数激增。以后随着表层锡矿枯竭，需要更高技术的机械，而使华工人数有所减少。1939 年，经过一场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摧残后，霹雳州的锡矿华工仍有 4 万人，可以想像在全盛时期华工的数量之庞大。除了在锡矿的华工外，由于锡矿业发展而引起其他行业发展，在怡保等霹雳州地区，华侨还从事水泥、五金、钢铁、橡胶、塑料、锯木、家具等行业，华人比例始终很高。在目前怡保市 40 万人口中，广府籍华人应超过 50%，即 20 万人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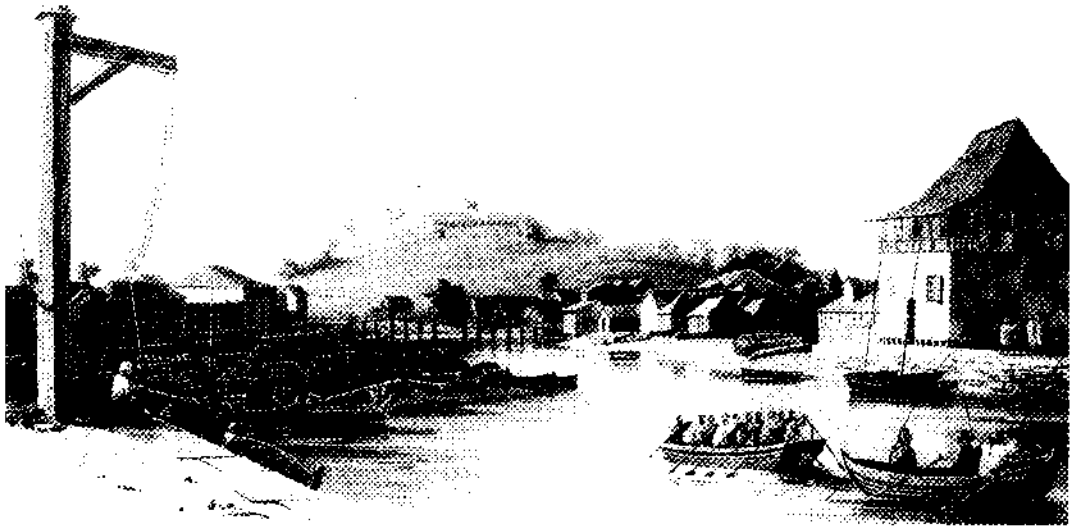
古晋：古晋是东马沙捞越州的首府，东马第一大城市，人口 12 万，以华人为主。在沙捞越，广府人只占华人总数约 7%，人数并不多，但比较多集中在城镇，尤其是古晋。古晋的广府籍华人约占沙捞越广府华人的 80% 以上，近 2 万人，但古晋及整个沙捞越以客家籍华人为主，通行客家话。

山打根：东马沙巴州的最大城市，人口约 10 万，其中华人占 75%。在沙巴的广府人相对于沙捞越广府人，

不太集中于某些主要城镇，有不少分散于农村从事耕作。但也有较多的聚居，山打根就是典型。山打根的华人以广府人最多也最有势力，他们中绝大多数从香港前来，带来不少香港的文化特色，所以山打根又被称为“小香港”。山打根的广府华人约有3万人。

9 广府华侨在新加坡

1817年，英国人占领新加坡时，全岛有居民150人，其中华人30人，1823年新加坡华人增至3517人，1850年华人有27988人，1871年华人有5.5万，1891年华侨人口增至121908，占全坡人口的66.1%。近代新加坡的华侨，除了自由移民外，有不少“猪仔”华工。19世纪的新加坡还是“猪仔”华工的重要中转站。新加坡成为海峡殖民地首府后，逐渐取代槟榔屿成为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中心，19世纪末，马来亚成为英国殖民地，新加坡的地位更加巩固，成为马来亚、婆罗洲、印尼、缅甸等地的商品集散中心，经济繁荣，人口持续增长。1901年，新加坡华侨华人增至16.4万人，1911年达219577人，1921年315100人，1931年增至418600人，几乎每年增加1万人，1941年华人达565182人，1947年729500人，1950年800456人，1955年12125882人，占当时新加坡人口98%左右，是华人在新



19世纪初新加坡河道上的华侨

加坡人口比重中的最高峰。1959年新加坡成立自治邦，1963年加入新成立的马来西亚联邦。1965年退出联邦，成立新加坡共和国。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一般认为有三个原因：其一，经济原因，富庶的新加坡希望保持独立财政；其二，政治原因，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有望成为马来西亚的执政党；其三，民族矛盾，加上新加坡的华人，整个马来西亚华人超过马来人。在殖民地时期，英国殖民者在经济上放任华人的发展，在政治上扶持土著马来人，实行分而治之的两元政治，如果在新成立的马来西亚，华人在政治、经济、人口上都压倒马来人，是英国和马来人都不愿看到的结果。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后，成为世界上除中国之外惟一华人占优势的国家。目前，新加坡总人口310万人左右，其中华人占78%。新加坡的华侨华人按籍贯分，闽南人最多，其次为广府人，20世纪30年代统计广府籍占有18%左右，1950年统计，广府籍占22%，以后基本未有大的变化。按目前新加坡华人230万左右计算，广府华人约50万。新加坡出过不少广府籍名人，如黄埔先生胡璇泽、慈善家毕俊辉等。

牛车水：尽管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城市国家，但其中仍有被称为唐人街的地方——牛车水。从1822—1823年间华人便聚居在今日牛车水地方，当时牛车水一带布满了华人餐馆、酒楼、剧院、店铺、庙宇、会馆，甚至妓院。目前牛车水范围约2.6平方公里，其



新加坡唐人街——牛车水的早餐街景

中纵横交错10多条街。牛车水是新加坡最大的商业区，街道两旁布满了老式的中国式店铺。由于整个新加坡现代化建设发展迅速，牛车水旧有的市政建设，房屋结构与周围景观大不相衬，改造势在必然。为了保持牛车水一带的传统文化特点和纪念意义，新加坡政府采取了传统于外，现代于内的建设方针。即在外观上，牛车水一带的房屋店铺戏院等大都保持了传统的外观，但内部结构用现代化的建筑方式重新建造，并辅之以一切现代的设施。因此便在新加坡形成一个外观上传统的唐人街文化区。牛车水一带长期以来以广府人最占优势，所以又被称为“小广东”，体现出不少广府文化特色。新加坡第一个地缘性社团即由广府的台山县人在牛车水建立，称宁阳会馆。牛车水一带是新加坡金铺的大本营，广府人始终执其牛耳。牛车水一带还长期有广府的“梳头婆”，专门替人梳头发，近几年才消失。

10 广府华侨在文莱

历史上文莱曾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中国史书称为渤泥、勃泥等，其领土曾包括今马来西亚沙捞越、沙巴的大部分地区。华侨移居文莱，至迟从宋代已经开始。近代由于文莱领土被侵占，所辖人口越来越少，该地华侨

华人也难以计算。20世纪初，文莱华人只有几百名。1911年文莱华人736人，1921年1423人，1931年2683人，1947年8300人，1960年增至21795人，1981年39461人，目前文莱人口约25万，其中华人占20%，约5万。文莱由于石油蕴藏丰富，人均收入很高，在国内实行高福利政策，加入文莱国籍受到严格限制，所以在文莱的大部分华人并未入籍，并且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不少华人仍持英联邦殖民地护照，实际上因为马来西亚和文莱的独立而失去了法律效力，因此，文莱的很多华人是无国籍者。文莱的华人以福建籍最多，占80%，广东籍占18%，以客家和潮州为主，广府人约有2000人，文莱广惠肇公会成立于1976年。由于文莱广府人较少，早年文莱广府人参加在马来西亚沙捞越第四省美里成立的美里广惠肇公会的活动，1976年才单独组会。

第三章

从小商小贩到商业巨亨

——广府华侨在东南亚的职业与生活

广府华侨在东南亚的职业

东南亚华侨社会的广府文化

广府华侨在东南亚的教育

1 广府华侨在东南亚的职业

在东南亚的华侨大都因为传统的关系，较多地以籍贯为中心，从事某些相近行业，以致某籍华侨在某国长期以来主导某一些行业，这也是东南亚广府华侨的特征之一。一般说来，在印度支那越、柬、老三国，广府华侨主要为商贩和工匠；下缅甸的商贩几乎全是闽南和广府人，缅甸木工都来自广府；在马来亚和新加坡，广府华侨也以商贩和工匠为主；在印尼，从事手工业的广府华侨最多；菲律宾的广府华侨主要从事商业。广府珠三角地区，长期与海外有密切贸易联系，自古有经商传统，商品经济发达又导致分工的增强，手工业也非常发达，所以出洋的广府华侨从事商业和手工业者较多。随着东南亚地区近代工业的发展，现代化生产方式的进步，广府华人中从事工业、金融等行业者也逐步增多。

(一)从事农业劳动的广府华侨华人

在早期华侨史中，在海外从事农业劳动者以集体移民为主，尤其政权更迭时期、国内动乱时期迁居海外者最为明显。10世纪时阿拉伯人马素提在苏门答腊看到众多中国人耕种于彼，说他们是黄巢起义时从广州来的中

国移民。明代初年，苏门答腊三佛齐一带有很多广府人和闽南人，从事农业生产，当地“土肥地美，谚为一季种谷，三季收稻”，当时三佛齐国乱，当地华侨推广府南海人梁道明为首领，“闽粤军民泛海从之者数千家”，他们主要从事农耕业。明朝末年，在爪哇万丹一带有“新村，约千余家，村主粤人也”，这些华侨“不但忙于商业，而且勤于经营农业，种植胡椒和酿酒业”。在加里曼丹岛，华侨主要从事耕植业，1830年刘直从广州到古晋务农为业，以后不断有广府人从香港等地前来。1901年，广府三水人孝廉邓恭叔在沙捞越组织“新广东农业公司”，在诗巫上游开辟“新广东垦场”，主要从三水、番禺、四会、清远、东莞等地招聘农业工人，“新广东垦场”主要种植胡椒。在邓恭叔带动下，不少广府和客家等粤籍人来沙捞越垦殖，如1906年李七伯、袁宝斋等人组织述善公司种胡椒、橡胶，同年董镜洲组织广南盛公司在沙临港种胡椒，此外还有陈稼良的广生园，冯伯雪的新进园，韩善甫的全盛公司，梁绍振的新广东农业公司等。1881年英国北婆罗洲特许公司成立，大量招收华人农业工人，到1921年，北婆罗洲公司有华工7933人，其中广府人4793名。在西马，从事农业耕植的华侨在明初已经存在。马六甲的中国山、中国溪、中国村和明初华侨古墓、古碑，表明了华侨在当地垦殖的历史。1641年荷兰占领马六甲时，曾见到许多从事农业的华侨。近代马来半岛的胡椒生产是华侨从

亚齐移植的，1795年，槟榔屿闽粤华侨种植胡椒者万余人，每年出胡椒2万石。在槟岛对面的威尔斯利，有许多华人的菜园，栽种椰子、生果和香料，有的华人种稻、种蔗。柔佛地区的农业也是由华侨开发的。柔佛苏丹实行港主制，发开港证者才可种植胡椒、甘蜜等，到1917年共开了138条港，港主大多是潮州人，也有广府人，如黄福开的丰盛港等，种植园工人中也有广府人。近代马来亚的橡胶种植非常可观，1911年马来亚各胶园华工有4万人，1917年增至18万人，华侨胶工以海南人居第一位，广府次之，客家人又次之。1920年马来亚橡胶产量超过橡胶原产地巴西，居世界第一位，其中凝聚了多少华侨工人的血汗。

在半岛地区，泰国很早就有从事农耕的华侨。19世纪初，已有很多华侨种植园，种植胡椒、甘蔗、烟叶、棉花、蔬菜等。华侨菜园主要在京城和其他都市附近。除了种植，家畜饲养也主要靠华人，泰国人传统上不养猪，养猪业全为华侨经营，从业者以广府人最多。在泰国渔业中，淡水渔业在近代多为越南人操纵，二战以后逐步由泰人渗透掌握。咸水渔业主要为华侨华人经营，华侨渔民以潮州籍最多，广府籍次之。在越南，从事农业的华侨很早就存在。大量从事农业劳动的华侨是在明末清初迁入越南的。1671年雷州人莫玖率家眷乡亲400余人，迁居越南河仙之地。莫玖到后率众开垦拓殖，耕种田地，修建屋舍，又在河仙外围建立禄治、顺安、阳

和等村社，昔日荒芜之地，变为富庶之区。由于河仙华侨以广府语系者占绝大多数，也被人称为“小广州”。1679年明朝广东龙门总兵杨彦迪、副将黄进，高雷廉总兵陈上川、副将陈安平率3000余人南投，被越南阮氏广南政权遣往湄公河三角洲一带开拓，杨、陈等“辟地开荒，杨立铺市”，将湄公河三角洲，同奈河三角洲一带大批未开垦的处女地拓殖为繁荣之区，其中不少华侨从事农耕，如波莱海门“沿边江河灌莽丛杂，内皆土阜，唐人、高蛮多栽芬烟、萝卜、瓜果，殊甚美硕”。美清海门，“广十里”，“华民、唐人、高蛮店舍稠密，栽植芬烟、瓜果、晒作干虾”（此处华民指越南人，唐人指华侨，高蛮指高棉族），南圻一带“其出力垦者，惟唐人为勤，而海纲、江登行商、居贾，亦唐人主其事也”（郑怀德：《嘉定通志》卷三）。可见华侨在南圻农业中的作用，而陈上川等人所带华侨绝大多数为广府人。这些明末清初的华侨移民，大部分转变为明乡人，以后逐步融合于越民族。此后，仍有不少华侨前来越南经营农业。越北地区华侨经营传统性农业耕植者为多，在南圻不少华侨经营商品性农业。如20世纪初，南圻龙川、迪石、河仙一带有不少华侨农场种植稻谷，以出口为主，胡椒种植园主要由华侨掌握，越南各地市镇附近的蔬菜园，以华侨经营者多，其中广府人最多，潮州人次之。在北部湾和泰国湾越南沿海的渔民，多为华侨，以广府人最多，其中也有不少雷民。在缅甸，17世纪时，就记载有

在缅南经营农业的华侨。在缅甸经营农业的以缅北为多，多为云南人，也有很多土生华人。在缅南，随着商品性稻米种植的发展，广府华侨首先涉足水稻种植业和稻米进出口。华侨与缅甸人民一起，在缅南开辟了不少良田。华侨在缅甸种植菜园的很多，不少取得了邻近市镇的蔬菜专卖权。在仰光附近的华侨菜园里，种植的蔬菜有芹菜、韭菜、油菜、蚕豆等，种植的水果有荔枝、红枣、枇杷、桃子、柿子等，这些蔬菜和水果的品种有不少是从中国传入的，大大丰富了缅甸的农业生活。除了种植水稻、瓜果外，华侨在缅甸还种茶、种花卉、橡胶，畜养牛、羊、鸡、鸭等家畜家禽。缅南华侨主要从事商品性农业的种植，其中不少是广府人。

（二）从事矿业的广府华侨

从事矿业是近现代华侨在东南亚从事的重要领域，华侨很早就到东南亚开矿，但只有到18、19世纪，才形成较大规模。近现代华侨采矿业主要分布在以下几个地区，采锡华侨主要在缅甸南部、泰国南部、马来半岛、印尼苏门答腊东南海岸一带；采银的华侨以缅北、越北、南圻为主；采金的华侨以加里曼丹岛最多，马来半岛、越南、缅甸也有。

群岛地区，在加里曼丹（旧称婆罗洲），18世纪时已有不少华侨采金矿，19世纪初，形成三大矿业公司，兰芳公司、三条沟公司和顺总厅公司，主要是客家人和潮

州人经营。19世纪中期开始，英国公司开始大规模在沙捞越一带开金矿，1898年，英国某公司在石龙门的金矿有矿工3000多人，其中矿工多为客家人，机工多为广府人，该矿成为英国在马来亚的最大金矿。20世纪初英国在文莱、纳闽岛一带开采石油，从新加坡等地招诱不少矿工，有很多广府人。目前在文莱、纳闽、米里等地的广府华人不少是他们中的后代。在苏门答腊东南，邦加岛是重要的锡矿产区。18世纪初，开始有闽粤华侨到该岛采矿。19世纪初英国掌握该岛锡矿，从澳门招来2000多华工。1816年荷兰从英国手中接管邦加锡矿，继续扩大使用华侨矿工。1840年邦加岛人口2.4万人，其中华侨矿工1万人，当时以广府人最多。鸦片战争后，大批契约华工出国，到邦加岛的主要是广东籍的客家人。1893年邦加华侨28363人，1919年邦加岛华工达22302人。邦加华工以客家人最多，广府人次之。湛江人杨春才在邦加岛做矿工40年，先后在13个矿场做过工。勿里洞岛是印尼又一重要锡矿产地，邻近邦加岛。1851年时岛上有28名华侨。同年，荷兰海牙勿里洞公司承包锡矿，从新加坡招聘了60名华工，1853年，勿里洞公司到香港和广州黄埔招募200多名华工，1892年，岛上有8000多名华工，1908年，有华工13678人。为了招收华工，勿里洞开辟了到汕头和香港的直达航线。邦加岛矿工以广府人和客家人最多。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勿里洞华工大多被裁退，1934年剩下3524名华工，大多是客家

人，只有少许广府人。

泰国锡矿比东南亚其他国家更早由华侨开发。约在18世纪，已有华侨在泰国开采锡矿，以后陆续有华侨来此从事锡矿开采。整个19世纪，泰国锡矿几乎全由华侨开采。泰国锡矿主要在两个地区，一是普吉岛，一是董里到六坤一带。泰国锡矿华工以粤籍为主，其中广府人最多。1928年，泰国锡矿工人有2.9万人，华侨占95%，广府籍约有1万人。世界经济大危机爆发后，有很多人回国。

在马来半岛，15纪初，已有闽粤华侨在马六甲附近采锡。随着当地矿源的枯竭，1770年，马六甲锡工大多被招至霹雳采矿。19世纪初，在马六甲附近又发现一批锡矿，华侨矿工再增至7000人左右，19世纪末，矿源又枯竭。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霹雳相继发现几个大锡矿，华侨人数急增。1862年霹雳有华侨矿工2.5万人，1872年超过4万人，以粤籍为主，北区为广府人，南区为客家人。19世纪70年代，在霹雳爆发争夺矿区的拿律战争，义兴派(广府人)和海山派(客家人)发生大规模械斗，大量华侨逃走。1873年当地华侨矿工只剩4000人。英国殖民者乘拿律战争介入当地政治，政局平稳后，华侨矿工数量逐渐恢复，1877年增至9000余人，1887年增至8万人，其后增至10万以上。霹雳矿工以广府人最多，此地也是广府华侨在马来亚最集中的地区。此外，在雪兰莪也有不少广府矿工，吉隆坡一带广府华侨始终

占华侨总人数的1/3左右，当中大多数是锡矿的矿工。森美兰也是锡矿的重要产区，19世纪中期当地锡矿业大规模发展，19世纪末华侨矿工有3万多人，以客家人最多，广府人次之。

马来半岛的丁加奴、吉兰丹、彭亨地区，富产金矿，18世纪末已有闽南、广府人采金，19世纪后，华工在此采金者以客家人为主，闽南人次之，广府人较少。在越南，很早就有华侨来此开采金银矿。清朝以来，越南“各镇金、银、铜、锡诸厂，多募清人掘采”（黎贵惇：《抚边杂录》卷四）。越北太原银厂，清初开采，西山起义期间关闭，1803年重开，华侨矿工人数始终维持在1万人以上，矿工以广东客家人和广肇惠为主。此外在宣光、兴化、清化等地有不少矿工，以广东籍为主，韶州人占有重要地位。1856年华侨首先开采鸿基煤矿，法国占领后，仍以华工为主，矿工以韶关和广府一带最多。鸿基市在20世纪90年代改名为下龙湾市，至今仍有不少广府人的后代，当地很多人能讲汉语、普通话和广州话。缅甸各种矿厂主要在缅北，矿工除了云南人外，长江流域以南各省籍均有。其中粤侨仅次于滇侨。缅北矿厂主要是银矿和宝石矿。缅南土瓦锡矿，在18世纪已有广府人在此开矿。英国人占领当地后，从槟榔屿招募华工，矿工以广府人最多，主要是香山（中山）县人，此后他们建有香山会馆，最多时该矿有华侨矿工1万人，始终以广府人占绝大多数。

(三)从事商业的东南亚华侨

16世纪初，西方殖民者入侵东南亚时，从事商业经营的华侨主要是海商和进出口商，还没有大规模从事东南亚的国内贸易。随着西方殖民商人的冲击，从事大规模对外贸易的华商大部分定居在沿海城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冲击下，商品经济影响到东南亚各国内地，不少华侨成为城镇店铺小店主和乡村的小商贩。在华侨商人中，小商小贩的小本经营占了绝大多数，能成为巨商大贾者少之又少。东南亚华侨小商贩主要有几种形式。(1)流动小贩。他们用肩挑或用小推车装载杂货日用品、蔬菜等走街闯巷叫卖，或者深入农村收购土特产，也有二者兼营，这种情况在东南亚各地普遍存在，但以越南最为典型；(2)固定摊贩。主要在市镇集市上，占有固定摊位，该集市一般有固定的营业时间，有些集市并不是每天都开放，一般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摊贩主要售卖日用品货物，如油、盐、酱、醋、蛋、肉、菜等，大都是日用必需品和主副食品；(3)小商。主要是城镇杂货店，属于“坐贾”，是小零售商。这种小店铺，东南亚各地有不同称呼，在印尼称“亚弄”店，菲律宾称为“菜籽”店，西贡堤岸，广府华侨称为“馆仔”。这种小店一般有一个铺面或店面从事商品买卖，经营货色品种较多，营业时间长，不像摊贩有固定的营业时间。在非都市区，一般还收购土特产品，并经常向顾客赊账。

店铺一般是小贩起家而办，经营者以家人为主。其中不少小商贩娶当地女子为妻或妾，方便商业经营。因此小商贩中有不少土生华侨。经营小商贩的华侨因其籍贯和传统的区别，某一籍贯的华侨常相对集中某些商品的经营。如闽南人与土特产、鱼产品关系密切，客家人常与工业品有关，闽北人多经营布匹，广府人喜欢经营与酒楼餐馆有关的买卖，这种区分不是绝对的，只是相对集中而已，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小店铺都是杂货店。各地小商贩中不乏广府籍华侨。

(四)成为商业巨亨的广府人

东南亚的广府华侨大部分是贫苦的劳动群众，只有极少数华侨通过努力捕得机会成为掌握一定资本的富有者。最早的富有者是通过经营海外贸易而致富的。在西方殖民者成为东南亚政治和经济的统治者后，很多华商成为中介商和包买主，他们利用中介批发商的地位，积累了一定的资本。但大部分的富有者是从小摊小贩开始，经过努力，一步步从底层奋斗、克勤克俭而成功的。如著名的广府人黄埔先生胡璇洋家族，就是从学徒到小店主而成为新加坡的富豪。据有一定的资本后，不少华商从事工业和种植园业。工业主要是初级加工和轻工业。如不少华侨曾在印尼、泰国、菲律宾从事制糖业。在半岛地区，碾米业是华侨投资最普遍的工业，主要集中在仰光、曼谷、西贡一堤岸三大米市。曼谷米业

中潮籍华侨势力最大。20世纪初，广府籍台山华侨马棠政创建全泰最大碾米厂——振盛较米厂，每日碾米400多吨。在西堤、第一个碾米厂就是由华侨在1878年创建的。在20年代初，西堤有米厂75家，72家为华侨所有。在缅甸仰光，米厂约一半是闽、粤华侨创办的。此外，广府华侨也投资纺织业、锯木业、肥皂业、药厂等，不少人成为富豪。除了工业，广府华侨还投资于商品性的农业种植园。如在新加坡从事甘蜜和胡椒种植业者，以潮人最多，广府人次之。在柔佛，苏丹以开港为名鼓励华侨开拓种植园，其中以潮州开港者最多，广府人次之。如大兴街场、丰盛港、逐港、沉香港、茂盛港、和丰港等均为广府人所办。广府华侨也有投资于矿场者，19世纪末，马来亚锡矿产量40%由华侨矿厂出厂。20世纪以后，也有一半左右。不少华侨投资于马来亚锡矿，如广府人郑景贵、陆祐等都拥有大片矿区，他们的矿区主要集中在霹雳和雪兰莪。20世纪初，华侨开始创办金融业。1903年广府人黄亚福在新加坡创办广益银行，是东南亚最早的华侨银行。此外，不少广府华侨还通过承包税收成为富豪。征税本是政府的管理职能，西方殖民者采用承包的商业活动来征收，未成为殖民地的泰国也仿效之。税收承包主要有三种形式，一类是村社承包，由承包人承包某一村社或地区的所有各种捐税；二类是税收承包，是对某地区某类税收的承包；三类是专卖承包，对某类专卖产品的税收实行国内或区内

总承包，如对鸦片、烟、酒、赌博业等的承包。税收承包是政府通过投标的形式，多投者获得承包权。承包者大部分是华侨的中上层，不少人是秘密会社的领袖，最有名的是泰国潮侨郑智勇（人称二哥丰）、增城人郑景贵（霹雳海山会首领）。广府人陆祐是承包税收而发家致富的典型代表。他13岁赴新加坡，给人打工，积累小资本后自营小商店“兴隆”，后至霹雳投资锡矿，不久，在霹雳承包税收，前后六年，“利益丰盈，溢息无算”。以后承包区至马来联邦各州，税收项目包括烟、酒、典当业等，他承包税收致富后，投资锡矿、橡胶园、水泥厂、榨油厂等，成为亿万富翁。广府人黄福，又名黄业福，18岁至新加坡，在某木器店打工，得到店主赏识，为店主代理掌管店铺。不久，因业务关系认识柔佛苏丹，遂全面代理苏丹土木工程业务，不久又承包柔佛各项税收，自己也在柔佛开港，多年后，“富逾千万”，晚年，黄福在新加坡开创华侨史上第一家银行广益银行。东南亚广府华侨有许多机会成为富翁，也有不少人通过努力发财致富，但大部分华侨仍然十分贫穷，处于社会下层。

二战以后，东南亚地区的大部分国家致力于发展民族经济，不同程度对华侨经济采取了限制措施，最明显体现在商业领域。在印尼、菲律宾、泰国、柬埔寨、南越（1975年前越南南方）都曾限制华侨经营大部分商品种类的买卖。为此华侨以入籍、财产转移（转给拥有当地国

籍的妻子、儿女)的形式继续经营，或者将资金转入其他行业，尤其是工业，因此，战后东南亚各国的民族工业大部分是由华侨华人开拓的。这是战后东南亚各地华人经济的新变化，当然，广府籍华侨华人也不例外。随着华侨的入籍，以及各国政府对华侨华人政策的放松，商业领域仍是广府华侨华人在东南亚从事的主要行业。

2 东南亚华侨社会的广府文化

走出国门的广府华侨华人，在海外侨居地工作和生活，但其生活仍处处带着广府文化的特色，在侨居地延续广府风俗习惯，对侨居地的文化繁荣做出了贡献。

粤菜是中国八大菜系之一(又一说为四大菜系之一)，俗语说“食在广州”，可知粤菜的可口及其在中国饮食文化中的地位。粤菜很早就随广府人移居海外而名扬全球。在当今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没有中餐馆，有中餐馆的地方就有粤菜馆。祖籍广府的华侨华人一直保持吃粤菜的习惯，不少广府人也以经营粤菜餐馆作为谋生的手段。广府华侨最早来到东南亚，也最早把吃粤菜的习惯带到东南亚。19世纪中叶，新加坡、马来亚等地就出现了不少粤菜馆。粤菜馆也是东南亚最多的中餐馆。粤菜的特色主要有：(1)餐馆、酒楼与茶楼的经

营方式。粤菜的经营因其饮食的不同需求和不同目的而有一般的小吃店、餐馆、办酒席的酒楼、饮茶的茶楼等不同形式。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许多中国驻外公使途经东南亚各地华侨聚居地，他们喜欢到广式茶楼聊天和休憩。(2)粤菜中有独特的广式点心，广式早茶、晚茶文化。如广式月饼的制作，口味与北方月饼大不相同，别具风格。随着广府华侨在东南亚的移民，广式月饼也传到了东南亚，不仅广府华侨，其他籍贯的华侨也喜爱广式月饼，连土著东南亚人也接受了广式月饼，其他种类的广式点心同样风靡东南亚各地。广式早茶、晚茶服务也是中国茶楼文化中别具一格的代表之一，其以茶会友的方式也流传到东南亚各地。(3)中国外地人对广府菜的一个评价是："天上飞的，除了飞机，四条腿的，除了桌子凳子，什么都吃。"这也是广府文化的特点之一。这种饮食习惯也被移居东南亚的广府华侨保留着，也影响到东南亚各地的华侨和当地人民，成为海外中国餐馆的特色之一。由于粤菜在中国及海外的巨大影响远超过中国其他菜系，所以海外的中国餐馆以粤菜馆最多，广府人基本上操纵了海外的中餐业，继之与餐饮业有关的酒楼业、旅馆业、养殖业等也以广府人经营最为红火，而这一切都由粤菜文化而引起。

粤剧，海外华侨称为"广府大戏"，是岭南地区影响最大、观众最多的剧种。粤剧也随着广府华侨的移民而传播于海外。19世纪中叶，新加坡的牛车水一带已有

广府戏，1857年新加坡的粤剧行业就组织了“梨园堂”，不久，新加坡的粤剧艺人模仿广州“八和会馆”组织“八和会馆”或“八和分馆”，马来西亚吉隆坡“八和会馆”属下有“新丽声”、“艳阳天”、“升平”、“嘉乐”等戏班。19世纪末李钟珏描写新加坡的粤剧说：“戏园有男班，女班。大坡共四五处，小坡一二处，皆演粤剧。”（李钟珏：《新嘉坡风土记》）可见粤剧在海外华侨社会中的地位。20世纪初，广州、香港等地的粤剧戏班经常赴东南亚华侨聚居地演出。有些名伶首先成名于东南亚华侨聚居地，再转赴国内。如出生于广州的谭少佳两岁时随父移居新加坡，在牛车水“普长春”戏班长大，10多岁就走红于东南亚粤剧界，19岁入主省港第一剧班“人寿年”戏班。1938年日本侵占广州后，不少粤剧界名人到东南亚各地组班演出，如谭少佳、马师曾、薛觉先、白驹荣、红线女等，先后到过越南、新加坡、马亚西亚、泰国等地。如今，粤剧已成为东南亚华人文化的重要内容。1990年广州举办羊城国际粤剧节，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都有粤剧团参加。除了粤剧外，20世纪30—40年代开始在香港等地形成的粤语电影、粤语歌曲也流行于东南亚广府华人中。随着香港电影文化流行音乐文化的繁荣，东南亚的非广府华人也非常欣赏粤语电影和粤语流行歌曲。

3 广府华侨在东南亚的教育

海外华文教育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最初华侨出国时，为了与家乡通讯联系，经常从身边朋友中学习写字，不少店员记账员稍懂文字，便成为师傅，店主和其他店员便成为学生，学习也无教材、无时间，在工作余暇以习字为主。海外华侨社会有了一定规模后，有的华侨家庭设立私塾、蒙学。私塾与蒙学堂多从家乡聘请教书先生，教学语言以各地方言为主，如闽人用闽语，潮人用潮语，广府人则用粤语，所以这些私塾和蒙学以各方言群体自行设置。私塾最早在18世纪初已有设立，19世纪以后数量逐渐增多。随着私塾的发达，经济优裕的侨社便成立书院，雍正年间，印尼巴达维亚侨社便成立有明诚书院，19世纪后期东南亚各华侨聚居区成立不少由侨社举办的书院。清朝末年，国内大办学堂，受国内影响，东南亚各地新式华校次第成立。1899年在马尼拉成立中西学堂，1900年巴达维亚建中华学校，当时最具规模的是槟榔屿的中华学校，学生学习科目有修身、读经、国文、外语、历史、地理、算术、物理、体操、图画9科，摒弃帮派异见，以国语授课。但为了与学生沟

通，教师仍不得已从闽、粤两地招聘。在当时的学堂中，仍以各帮会自设的学堂为主，教学语言以各帮方言为主，广府华侨的学堂常以穗城、广肇、知用等命名。民国成立后，国内外民族热情高涨，加上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各地华侨学校建立如雨后春笋般成长。民国元年，东南亚各地就有数十所侨校成立，民国二年，东南亚各地新成立的侨校也不下 20 所，这种新气象一直持续到 20 年代中期，期间东南亚侨校的规模和数量可想而知。学校初以小学为主，后扩办至中学，增加职业课程、师范班，附设幼儿园等。中学最早为槟城的中华学校，师范教育也始自中华学校之“师范传习所”，职业教育始设于菲律宾怡朗，幼儿园始设立于新加坡之星洲幼儿园，此时期是侨校的辉煌时期。30 年代初，世界经济大危机，东南亚华侨经济大受影响，受侨社帮会支持的侨校不少因资金问题停办。经济危机过后，侨校发展有所恢复。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后，中国不少富商巨贾、文化人士纷纷迁居东南亚，促使东南亚各地新成立一批侨校，增添了不少优秀师资。其有名者如马尼拉的中正中学、新加坡的中正中学、越南堤岸知用中学、岭南中学等。日本侵占东南亚后，华校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战后初期，中国作为世界五强之一，国际地位增强，民族热情强烈，华校重建，学校复学，是为东南亚华侨学校的又一辉煌时期。这时期开始有华文大专院校的设立，如新加坡的南洋大学、菲律宾的中正学院等。50 年代以

后，东南亚大部分国家获得独立，民族情绪高涨，对华侨从经济上限制，从文化上抑制，迫使华侨同化。大部分东南亚国家采取了限制华文教育的措施，华校处于低潮。目前华校处境相对较为宽松的是新、马。在马来西亚，华文小学可由国家资助，华文中学可以开办，但国家不资助，华人称为“独中”（独立中学）。在其他东南亚国家虽也有一些华校，只是在课程设置上有一些中文的课程，仍以当地语言为教学语言，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华校。90年代，泰国新办华侨崇圣大学，欲成为东南亚主要的华文大学。九七金融危机爆发后，华人经济大受影响，崇圣大学的资助出现问题，被收归国有，华校的特色逐渐淡化。

越南：越南的侨校设立最早，且有不同于他国的特点。越南深受汉化、推行科举，奉行儒学，以四书五经为科举的重点。儒家经典、中国古典史书流行于越南各界。越南学校之经史课本常以中国书籍为主，惟语言不同，声调读音有异，但与粤语、潮话颇为相似。而其著文写书也以汉语文言为工具，与中国文人无异。所以，清代前期，华侨就设有私塾，且可参加越南科举。但近代意义上的华校，越南设立较晚。广府华侨在越南的第一所学校是1911年李卓峰等人在堤岸所办的穗城学校。同年，广府人谭质均在海防创办时习学校。1913年，堤岸有广府的坤德女校、广肇学校等，以后又有十数所广府人的学校在越南各地创办。1921年以后，华校发展加

快，广府帮又办有西贡同义学校、广肇学校、城志学校，海防懿英女校等。1931年，堤岸设暨南中学，是越南侨校的第一所中学，此后西堤相继设立几所中学。在海防，广侨办有华侨初中，在河内设有中华初中。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广州教育界人士迁越者甚众，西堤成立中山、岭南、华侨、知用等中学，广肇学校亦设立中学部。知用中学在越南侨校首办高中部，以后岭南、穗城等学校相继设立高中班。二战结束后，不少教育界人士返回国内。50年代，南北越分家，北越侨校迁至西堤者较多。1946年，西堤有侨校88所，大部分为小学，只有9所学校办中学，广肇帮学校有广肇、城光、英德等办初中。法国殖民统治时期，对华校的政策是可以用汉语各方言任教，但每周必须有6小时法语课，4小时越语课。1956年，南越政府强迫同化政策，华文学校带有强烈中华色彩的必须改名，中学须用越南教材，小学增加越南语课程时间，如堤岸穗城中学改名为越秀男子中学，西贡广肇小学改名为日新小学。1968年西堤仍有华校高中部14所，如知用、越秀、岭南、英德、志城等。1975年越南南北统一，各地华校被迫取消。

柬埔寨：早期柬埔寨华校以私塾为主，潮侨开办的最早，此后各帮会纷纷自行设立学校。1929年，广肇惠帮会在金边设立广肇惠学校，以小学为主，1955年才增办中学。1956年统计，柬埔寨有华校172所，学生23800余人，其中广肇惠、端生等7所学校有中学。在柬校园

规模最大的华校是广肇惠中学，位于金边市郊，环境幽静，适于求学，学生超过千人。柬埔寨独立后，对华校有所限制，不准招收柬人子弟，主要针对侨生华人子女，学生数目渐少。1975年民柬掌握政权后，华校被取消。90年代，柬埔寨问题和平解决，对华侨华人放松管制，华校有复办的迹象。

老挝：老挝华侨以潮籍最多，其侨校也以潮侨最为活跃。广府籍在川圹、他曲办有小学，其他地区则无，子弟入潮帮或客帮学校，在首都万象有各帮共建的中学。70年代老挝华校被取消。

泰国：泰国华校正式创办，始于孙中山1908年在曼谷广肇别墅促建之华益学堂。1909年，五帮华侨合办新民学堂，由萧佛成主持。1912年各帮又合办联合学校，以后因教学语言问题，各帮同意分设以本帮方言为教学语言的学校。1914年，广府华侨办明德学校。1917年各帮纷设女校，广肇帮陈长礼等办坤德女校，以后与明德学校合并。一战后泰国经济发展迅速，侨校数量与规模亦迅速扩大，各地侨校增多。1934年中华总商会在曼谷办中华中学，是当时最完备的中学。泰国政府一向对侨校有较多限制，学生需受较多泰文教育，尤其土生侨民。1939年銮披汶执行泰化政策，大规模查封华校。日军侵泰后，华文学校停办。战后初期，华校纷纷复办。銮披汶再次上台后，华校再受限制，不少华校停办。存在下来有名者如中华总商会主办的华商学校、广肇帮会

主办的广肇学校等。目前泰国虽仍有华文学校存在，但其性质已经改变，教学语言均用泰语，华文只是相对于其他初级学校而言多了一门外语课而已。

新加坡：道光年间，新加坡已有私塾、蒙学馆成立，1829年新加坡有华人私塾二所，其中粤侨二所，闽侨一所。1854年闽侨办萃英书院。1881年领事左秉隆到任后，积极支持兴办华文学校，先后成立几间华校。20世纪初，新式学校纷纷成立。如广府华侨于1905年创办广肇学堂，后改名养正学校，新会华侨办宁阳学校。民国时期，华校增多，1941年，新加坡华校有351所，学生37.5万人。日本占领期间，华校几乎全部停课。二战后，华校规模扩大，1949年学生达7.35万人，新加坡独立后，由华人主导政治经济，华文学校始终存在，为了本国在世界经济政治中的发展，新加坡大力提倡英文教育，支持英文学校的发展。目前，新加坡华人子弟在英文学校读书者远比华文学校者多。

马来西亚：在19世纪槟榔屿华侨界已建有南华书院。近代学堂于1904年首先在槟城建立，1905年，广福学堂等三所学堂成立，1909年，霹雳广府华侨建有东华学校等。民国成立后，侨校增多。各地侨校均由帮会设立，以方言教学。30年代初，因世界经济大危机影响，不少华校停办。二战后，华侨学校重新繁荣，1949年，马来亚有华侨学校1338所，学生20多万。马来亚独立后，仍准许华文学校存在，其中华文小学由国家资助。

华文中学自筹经费，华人称为独中，独中文凭若要获得承认，须参加马来西亚教育部的中学毕业考试，通过者方获承认，准许参加马来西亚大学考试。在独中读书的华人子弟不少到中国或欧美读大学。

印度尼西亚：在清朝雍正年间，巴达维亚（雅加达）华侨已设有明诚书院，以后私塾、蒙学馆增多。光绪年间，印尼新式学堂建立，1900年首建八华中学，至1903年印尼各地已有20余所华校设立，1906年，印尼侨社设立学务总会，总筹印尼华校的发展。民国成立后，华校更多，1919年已达250所。1948年，印尼华校共有621所，学生141600余人，1957年，印尼华校有1669所，学生45万多。60年代初，印尼开始限制华校，72%的华校停办。九三〇事件后，华文学校全被关闭，不少学生回国升学。广州地区就接待了不少华人子弟回国读书。90年代末，印尼对华文教育有所放松，允许公共场所使用华语，允许举办华文补习班，大学中增开了汉语课程等。

菲律宾：菲律宾华文教育始于20世纪初。1903年建立华侨中西学堂。民国以后，菲各地华侨兴办各类学校，如马尼拉广府人创办有粤侨小学。人数较少的侨居地大都由各籍华侨合办学校。民国初年，菲律宾成立华侨教育会，推动菲华文教育，尽力淡化帮会色彩，如将马尼拉的中西、粤侨、爱国等学校改为第一小学、第二小学、第三小学等。到1956年，菲律宾共有华校153

所，学生4.8万人。独立后，菲政府开始菲化华校，70年代中期，菲华政策达到顶峰，华文学校必须以英文和他加禄文为教学语言，中文教学每周不超过100分钟，华文学校基本不复存在。

缅甸：在缅北滇籍华侨聚居地，很早就有私塾建立。在缅南，1872年广东观音古庙附房建成，专供书塾所用。1903年，近代学堂中华义学在仰光成立，并附设“益商夜校”。民国以后仰光华校增多，广府人创办的有粤秀学校、培正学校等。此外，在勃固等地也有不少华校建立。1918年，仰光广府华侨组建“学务统一委员会”，将广府人办的育德、培正、求真、粤秀合并为粤侨公立育德学校及育德女校。日本侵缅期间，缅南华校大都停办。缅北由于中国军队入缅作战受到感召大办华校。战前缅甸华校，闽、粤两帮界限明显，致使不少资源浪费。战后华校大多两帮合办，若董事长为闽人，则校长由粤侨担任，反之亦然。60年代，缅甸有华校近千所。60年代后期，全被收归国有，华校不复存在。80年代后期，各种形式的华校开始有重办之势，缅南华侨不如缅北土生华人热情高。目前华校主要在缅北曼德勒、腊戍、八莫等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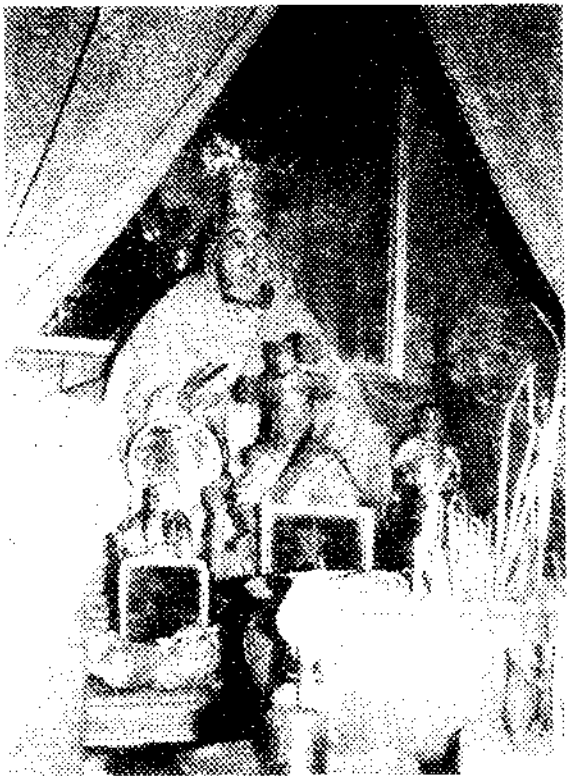
第四章

五缘社会的华侨组织

——广府华侨在东南亚的社团与组织

海外的华侨社会如国内社会一样，有各种各样的社团组织，这些社团主要是因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文缘等五缘关系而结成的组织。华侨社团的孕育与形成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历史原因和文化因素。第一，中国移民的绝大多数是沿海各地的城乡贫民，出国之后得不到祖国和政府的支持和保护，只能寻求其他形式的保护；第二，华侨移民大多通过亲友介绍提携出国，通过各种宗亲组织帮助在国外站稳脚跟是最好的出路；第三，中国移民在国内的封建迷信、祈神思想与海外孤立无援需团结互助的思想结合在一起，使国内一些帮会组织形式移植到海外，不少社团组织就是帮会组织的发展和演变。

早期华侨社团形式是以建寺庙的活动为特征，祈求神灵保护是远离故乡的重要精神寄托。最早的东南亚华人寺庙建于何时已无可考，在18世纪后期，印尼、马来西亚地区已有不少华人寺庙，如各种大伯公庙、观音庙等。1800年，在槟榔屿的广府华侨和闽南华侨共建广福宫敬奉观音菩萨。由于中国国内方言之间的巨大差异，使以文盲或半文盲为主的出国华侨以方言分隔的现象非常普遍，以方言为基础结成社团也就自然而然。方言会馆实际是借助国内早已存在的会馆形式，如在京城或大都市普遍存在的各种地域的会馆。方言性会馆与地域性会馆既重合又有区别。如广府帮会，其组成人员主要是广州、肇庆及惠州府讲广州话的人群，但在广肇惠三府



东南亚华人宅宇里的清元真君



纪念清元真君的碑文

有不少讲客家话的人群，他们并不参加广府帮，大部分参加客帮，或组织更小的地缘性组织。在以方言为基础的帮会之下，有以县或府为单位更小的地缘组织。县级如台山县的宁阳会馆、新会县的冈州会馆、中山会馆、三水会馆，府级如肇庆会馆、惠州会馆、以及五邑会馆（非府非县）等。省属同乡会有广东会馆、福建会馆等。业缘性社团类似职业行会，这些团体既有以侨居地为区域单位的地区性组织，也有以祖籍地为基础的方言性或血缘性职业团体，如1868年新加坡的粤籍土木建筑工匠合组“北城行公司”；1857年新加坡广东粤剧艺人组成“梨园堂”。19世纪末，新加坡出现更多业缘性团体，如广府帮木匠组织“鲁北行”，广府五金工人组织“文华行”；驳船业工人组织“驳船厄”等，比较高级形式的代表是各地成立的中华总商会。此外，海外华侨中盛行血缘性社团，这与国内华南地区宗亲组织有关系。早期血缘性组织受限于祖籍地与侨居地，如1820年新加坡曹亚志组织的曹家馆，以台山曹氏为主。1848年四邑陈氏会馆（新加坡），1854年新加坡台山黄家馆等，以后吸收成员范围逐渐扩大。如新加坡吕氏公会，广东林氏公会，客属林氏公会等。有的宗亲会不止一姓，如“古城会馆”包括刘、关、张、赵四姓，“至德堂”则由吴、周、蔡、翁、姬五姓合组。大约20世纪初，各地华侨开始组建更广泛更综合的社团，1900年，印尼巴达维亚华侨组建“巴城中华会馆”，在马来亚槟榔屿华侨组建

“平章会馆”，霹雳华侨组织“霹雳中华大会堂”，此后，东南亚各地华侨大都组建以“中华总会”、“华侨联合会”、“华侨公会”等名义的综合性团体。东南亚的各种侨团数量众多，前后存在过及目前仍存在的有数万个之多，其中尤其以新加坡、马来西亚地区的社团最具代表性。

越南：越南是东南亚成立侨团最早的地区，明末清初，陈上川等自广东沿海退居越南南圻，组织明乡社。西山起义期间(18世纪末)，越南就有以方言团体组织的帮会。近代史上，越南华侨帮会除方言团体外，还有较小范围的会馆与同乡会。如穗城会馆、新会同乡会、南海同乡会、增城同乡会等。1904年越南华侨组织综合性的团体“中华总商会”，1949年南越华侨将“中华总商会”改为“南越中华总商会”。此外在南越地区还存在校友会、宗亲会等社团，非常普遍。1975年越南统一后，社团组织大都被禁止，1986年华人社团复活。目前存在较多形式的有帮会馆，广府籍华人组织有穗城会馆，设在西贡(胡志明市)天后宫，会馆主要从事一些慈善活动。

柬埔寨：二战前，柬埔寨成立有各种形式的华侨社团组织，最主要的是帮公所。法国殖民统治者以帮公所控制华侨。1948年，帮公所被取消，中华理事会馆成为综合性的社团。1975年后，各种社团组织被取消。1990年，柬埔寨重新放开华人社团的活动，首先成立柬埔

寨华人理事会，各帮会馆相继恢复，广肇会馆1991年恢复。华人社团成立后，不仅资助华人社会，也帮助柬埔寨民族的各项社会事业。

老挝：老挝华侨社团与柬埔寨相似。二战后，以帮公所为管理组织，1946年改为中华理事会，1954年改为中华会馆，是各帮组织的综合性团体。70年代末，老挝华人社团停止活动。1988年中华理事会成立，各地小型社团也纷纷恢复。目前老挝华人社团与政府关系密切，经常资助当地公益事业，受到老挝人的尊重。

泰国：泰国华侨社团的组织，以1877年成立的广肇公馆为早期代表，广肇会馆时称广肇别墅，以后潮州会馆才成立。1910年泰国中华总商会成立。战后泰国华人社团没有特别的改变，目前全泰华人社团2000余个。全国性的有泰国华人工商同业公会，帮会组织仍有广肇会馆，县级同乡会主要是潮州一带县级会馆，广府地区有花县会馆等，此外还有各种慈善团体，如“报德善堂”，深受泰国佛教社会的影响，泰华社团的许多组织已与泰人社团密不可分。

缅甸：缅甸华侨组织也以寺庙为早期形式，如仰光广东观音庙为早期代表。较早的组织还有秘密会社，1853年广府人在仰光组织义兴公司（洪门组织）。缅甸的同乡会馆与各地无异，也有广肇会馆、福建会馆等，县级同乡会有宁阳会馆（台山）、冈州会馆（新会）、五邑会馆等。各种宗亲会也如其他地区，并多与其他各国宗亲会

有密切联系。1951年，缅甸有华侨社团430个。60年代中期以后，各种华侨华人社团虽名义上仍存在，但由于国有化的改革，失去了经费支持，没有什么活动。80年代，缅华社团有328个，80年代末，华人社团活动有所恢复。

印尼：作为一个大国，印尼华侨华人众多，华侨社团组织成立的早，数量也很多，在首都雅加达，广府组织的广肇会馆是三大侨团之一。印尼也有中华总商会、各种地缘性组织，宗亲会如他国一样，数量众多。印尼侨团的命运有如缅甸，20世纪60年代以后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并未取消，苏哈托下台后，华人社团活动重新活跃。

菲律宾：菲律宾一直以来都没有对华侨华人社团有过多的限制，华侨社团组织数量庞大，20世纪70年代有1000多个。广东会馆成立于1900年，马尼拉中华总商会成立于1904年。目前，菲律宾有广东侨团总会，简称粤总，是广东各侨团在菲律宾的综合性组织。在菲的粤籍华侨华人以四邑人为主，有四邑人的同乡组织。

文莱：文莱的华侨社团组织约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目前约有近40个组织。文莱广惠互助社成立于1970年，主要进行一些慈善性的福利活动。文莱广惠肇公会是1976年从马来西亚美里广惠肇公会分离出来的。1983年广惠肇公会成立下属青年团，广惠肇会会是文莱广府人的主要组织。

新马地区：在东南亚地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由于华人占人口比例较大，并形成新的民族——华族，华人社区的发展较其他国家更为完善，华人社团组织得到较好的发展。新马的广府华人社团组织主要包括三种形式，即地缘、血缘和业缘组织。

地缘组织中，首先是广东会馆，由广府和其他广东籍华人共同组建，新加坡广东会馆成立于1937年。马来西亚各地有26个广东会馆，广东会馆联合会则成立于1947年，会址在吉隆坡。马来西亚还有不少广肇会馆，是由广州和肇庆两地讲白话的华侨华人所组建。新马广府华人的府县级会馆数量很多，如新加坡有宁阳会馆(台山)、中山会馆、冈州会馆、番禺会馆、三水会馆、花县会馆、增龙会馆(增城龙门原为一县)等。其中有些会馆成立很早，如宁阳会馆成立于1822年，中山会馆成立于1838年。马来西亚各地的府县级地缘会馆情况与新加坡相似。地缘会馆是新马华人社会最活跃的社团组织，会馆中一般都附设有福利机构，如音乐部、戏剧部、互助部、体育部、妇女部、智育部等，积极开展慈善福利事业，推动华人社会文体事业。新马各地广府同乡会大都为青年学子设立有奖学金，鼓励他们积极进取。同乡组织兴办的福利事业以办义山最为著名，如新加坡广惠肇碧山亭公所成立于1890年，目前有义山18座，广府华人祖先坟墓几乎全在此地，该公所曾兴办碧山亭小学，收容贫家子弟。

血缘性组织即宗亲会，宗亲会建立的宗旨在于联络宗族的感情，调解宗族内部的矛盾。各宗族内部都建有互助部，协助族人办理丧事。宗亲会每年春秋两季祭祀祖先，举行会员联欢。新加坡最早的宗亲组织是曹家馆，创建于1819年，创办者是台山人曹亚志。四邑陈氏会馆为广府台山、新会、开平及恩平四邑陈氏所建，凡属四邑陈姓均可加入。有些宗亲会只许男子加入，如新加坡台山黄家馆。海外华人在国外孤立无援，大都加入宗亲会。各姓氏都建有宗亲团体，在新加坡就有100多种姓氏的宗亲组织。宗亲组织的成员最初局限于小地区，后来则跨越县、府及省的界线，在海外的机构设置则超越了国界。

业缘组织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由商人组织的，一类是由工友组织的。新加坡最早的华侨业缘团体是北城行，该组织创立于1868年，是广府籍建筑工友的行会，供奉鲁班先师。新加坡广府人的业缘团体还有文华行(五金业)、梨园堂(粤剧)、品罗堂(理发师)等，马来西亚也有类似组织。

秘密会社，拿律战争与霹雳广东会馆联合会：秘密会社是海外华侨华人重要的社会组织，早期组织大都属于洪门或称天地会。秘密会社大约在乾隆年间传至东南亚南亚地区，其活动最早的地区是加里曼丹岛和新马地区。下面我们以拿律战争为例来说明秘密会社与广府华侨华人的关系。到了19世纪60年代，天地会会员在华侨

中发展很快，尤其在槟榔屿、新加坡与马六甲三地。槟榔屿是马来亚华侨秘密会社的发祥地和活动最为激烈的地区。马来亚的秘密组织以义兴和海山两派势力最大，总部设在槟榔屿。义兴公司以广府四邑人为主(指台山、新会、开平、恩平，非广府人也可参加)。海山公司又称大伯公会，以闽南人为主，其他各籍也可参加。19世纪初，霹雳州拿律地区发现锡矿，不久，大量华侨前来开采锡矿，1862年华侨达两万多人。槟榔屿秘密会社义兴海山两派势力在此发展成员。1862年，两大锡矿吉利包锡矿为海山公司掌握，首领郑景贵，广东增城人。甘孟西矿区为义兴公司开掘。吉利包锡矿主要为客家籍矿工，大都参加海山派，甘孟西矿工为广府人，参加义兴公司者占绝大多数。双方虽有矛盾，初无冲突。19世纪60—70年代发生了两派大规模械斗的拿律战争。1862年义兴会员14人在吉利包赌场赌钱，被海山公司以越界捕杀，义兴公司诉于马来土酋，土酋恃强凌弱，驱赶义兴公司会员，在英国人压力下，义兴会员重回矿区。1867年矛盾蔓延至槟榔屿，两派发生大械斗。1872年拿律矿区两派再生矛盾，发生大规模械斗。双方互相厮杀抢劫，矿区斗争再次蔓延至槟榔屿。槟城两派经常发生冲突，致使拿律矿区矿工纷纷逃走，无法正常开工，槟城华商各入会党一派，市场萧条，商业停滞。1873年英国殖民者参与调停，1874年缔结邦咯条约，霹雳受英国保护，成为英国殖民地，槟城及拿律秘密会社两派和解。

殖民政府将拿律改名为太平，意为从此以后，永远和平。太平地区华侨以广东人最多，1877年建有惠州会馆，1869年建有琼州会馆(海南人)，1878年建增龙会馆，1881年建占冈州会馆。鉴于此前的拿律战争，广东各派认为必须建立一个联合组织，增进乡情。据1967年太平广东会馆联合会年报回忆说："……当时有'海山'和'义兴'两派，为争夺地盘常发生械斗，及后双方领导当局，均感觉长此斗争，实非同乡之福，遂捐弃前嫌，握手言和，此后同心协力，开采地方资源，各自建立基业……广东同乡日众。咸感缺一地总，以供同乡聚会，而联络感情，认为憾事。当事乡贤郑景贵、陈亚炎……有鉴于此，乃发起倡议建'广东会馆'。"拿律战争引起的太平广东会馆的建立是广府华侨在东南亚各种社团组织的转变和演化的极好个案。

第五章

赤子情怀与华南巨变

——东南亚华侨与广州的发展

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华侨资本是重要的资金来源之一。尤其在上海和闽粤两个侨乡地区，华侨的资本更是占了重要的地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始于1872年，广府华侨陈启沅在广东南海创办继昌隆缫丝厂。19世纪末，华侨投资国内企业有60多家，集中在广州、厦门一带，从行业结构上看，主要是进出口行、旅店、侨批业、轮船业及缫丝厂。清朝末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失败后，清政府大力举办实业，修建交通设施，华侨资本投入国内修铁路者最为典型。民国成立后，不久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民族资本发展出现“黄金时期”，华侨投资出现新的高潮，从1912—1919年间，华侨投资的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以及房地产业多达1042家，投资在广东以交通业及商业为主。一战结束至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这段时间，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段黄金时期，东南亚华侨资本也得到迅速发展，不少积累资本转投国内。1919—1927年间，海外华侨投资国内企业5904家，其中广东占5378家，投资广东的重点，转到房地产业，尤其1922年孙科任广州市长后，大力拆迁旧城，投资市政建设。吸引了不少华侨资本，华侨成立有华南置业公司，嘉南置业公司等。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海外华侨都受到了影响，投资规模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而在广东、陈济棠治粤时，大力吸引侨资，引进不少海外华侨资本。近代海外华侨对广东海南两地投资中，共有企业21268个，其中投资在广州的

有9125个，占总数的38%左右。近代华侨对广东投资中，房地产业占第一，有企业17790，约占总数的84%，其次是商业企业，1473个，金融业（侨批业为代表）1005个，工业企业332个。从全国范围看，侨资来源地区中，东南亚各地华侨投资占44.43%，美洲占13.55%。单就广东省，东南亚地区也是最多侨资的来源地，近代广东民族工业中，华侨投资的工业约占总数的一半，而广州无疑在其中占中心地位。华侨投资对广东社会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越南华侨陈启沅1872年在南海西樵创设中国第一家机器缫丝厂——继昌隆缫丝厂，随后在南海、顺德一带创设了多家机器缫丝厂，使过去以手工丝出口转为机器丝出口，为当地提供了众多就业机会，使当地思想观念也产生了重大变化。据说："三四年间，南（海）顺（德）两邑相继起者，多至百数十家。"到1901年"全省缫丝均用机器……妇女之佣是营生者十数万人……生丝出口已达4000余万（两）"。至此，广州一带成为民族资本机器缫丝业的中心。1881—1882年，广州土丝出口11526担，1900—1901年土丝出口1037担，机器丝1882—1883出口1254担，1900—1901年出口31038担，可见广州附近机器缫丝业的发展。华侨投资也间接推动了广州城市经济的发展。近代华侨在广州开办了不少商业店铺，在惠爱路、上下九路等地有不少华侨商铺，东山区新商业网的建设，归功于侨资的投入。东山区在近百年前是一片荒

凉的山丘，美洲和南洋华侨在东山兴建房地产，捐资办学建医院，开商店办工厂，使东山成为广州市重要的繁荣区域。华侨还投资广州市内的交通建设，广州市早期的公交车事业就是由美洲和马来亚等地华侨最先投资发展的。总之，近代华侨投资极大推动了广州的社会发展，下面叙述一些近代东南亚华侨投资广州建设的情况。

19世纪50年代，广州手工业逐渐向机械生产转变，出现了一些采用机械生产的新兴行业，如火柴工业等。据统计，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华侨投资广州工业共有209个企业，其中食品加工业33家、食品业26家、化工26家、五金制造23家、橡胶工业18家、印刷15家、制药18家、火柴工业11家、油漆7家、建材6家、金属铸造6家，制革业5家等。

1909年，南洋著名侨领张弼士投资创办广州亚通纺织厂，开纺织工业在广州的先河。亚通机织厂从国外购买机器，聘请外国技术人员，使用本国工人，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张弼士在广州还开办张裕安堂药行，位于靖海路。这个药行专门在国内的东北、华北、山东等地采购药材，兼营各种名贵中药，如人参、鹿茸、犀角、藿香等，也收售一般中成药。药材由各地送至广州后再批发到海外各地。该药行药材售往曼谷、西贡、马尼位、东京、三藩市、檀香山等地的中药行。该药行也从国外输入肉桂、虎骨胶、金鸡纳霜(奎宁)、燕窝等名贵药材

以及一般西药，转投入国内市场。张弼士在广州投资房地产业，在米市路崔府街有一座“张孝友堂”，他也热心于公益事业，晚年立下遗愿，资助岭南大学，其后裔替他捐赠“张弼士堂”，即今中山大学档案馆和总务处办公楼。

广州是国内最先有橡胶工业的城市。1915年，原籍广州侨居马来亚怡保的华侨邓兆鹏与新加坡华侨陈玉波合作，从国外引进一批先进机器，创办“中国第一家广东兄弟树胶公司”。该厂建成后，技术由邓兆鹏和陈玉波负责，后续资金由邓父邓凤墀和陈玉波亲戚张氏兄弟负责。1917年工厂正式开工，初雇用工人20人，很快增加到100人，主要生产胶制鞋托和男装胶鞋底。男装胶鞋底以双箭标志加上“中国第一家”五个字作为商标。这种胶鞋底美观、防水、耐穿，而且价格也不贵，一经问世大受欢迎，大新、先施等大公司和许多鞋店争相订购。产品供不应求，起初每天生产二三百双，以后加倍生产才基本满足需求，产品畅销全省和华南各地。工厂初设于广州河南龙导尾。由于安全管理不善，发生一次汽瓶爆炸，当地居民意见很大，以后又迁往河南鳌洲大街。由于对工厂管理意见不统一，工厂拆股分家，分为兄弟胶厂和中国大一家两厂。邓氏父子经营兄弟胶厂，不久因收到绑匪勒索，1923年邓氏父子将工厂转让给黄彦卿等人，改名为“合作胶厂”。邓氏父子携资转往香港发展，开设“广东兄弟树胶公司香港分厂”，1927年

又在上海设分厂。陈玉波等人在广州经营中国大一家胶厂，其规模和产量逐渐赶上以前的中国第一家工厂，取代了它的地位。在该工厂带领下，东南亚一带华侨纷纷来广州创办橡胶制品类工厂。二三十年代广州先后开办20家具一定规模的橡胶厂。除大一家胶厂外，冯强胶厂也是其中的代表。该厂位于泰康路，由马来亚华侨冯四出资于1921年开办，其中新加坡归侨肖侨鸿、司徒广等人负责管理，万玉田负责技术。主要产品是大象牌胶鞋产品，产品一上市就受到顾客的信任。1931年冯强胶厂改组，由冯四及其女婿邓恩泳管理，厂址迁到河南海珠桥下，生产运动鞋、网球鞋、女装鞋等，产品质量好，花色品种多，产品畅销国内及东南亚地区。工厂规模也不断扩大，工人由100多人增加到400多人，日产胶鞋由1000多双增加到6000双。广州被日本侵占后，邓恩泳把胶厂迁到香港。

广州食品誉满全球，粤菜是其代表，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强的竞争力。1916年，菲律宾中山籍华侨马玉山在香港注册马玉山饼干糖果有限公司，资金300万元，制造姜糖及玻璃储物罐，随后在广州设立分公司。1925年，香港公司破产，广州分公司由冯筠隆接收，改名玉山公司。1926年改名玉山机制饼公司，生产饼干、糖果、各种点心等，利用机器制作广式月饼，产品不但畅销广州，还销往香港及东南亚各地。成为近代广州著名的食品企业，1953年并入岭南饼干厂，产品不但畅销广州，

还销往香港及东南亚各地，成为近代广州著名的食品企业。1935年，东南亚华侨梁立安兄弟集资开办广州泰安油厂。日本侵占广州后被日占用，战争胜利后，梁氏兄弟收回。1946年江侍华、邓龙光等参与经营，梁氏兄弟以机器设备作价作为股东之一，由江氏等人具体经营，1949年后该厂停止。

1931年，东南亚华侨关汝驹、关心泉等，在广州筹办广怡原制革厂，1933年正式投产。该厂有正式工人50多名，其中东南亚归侨技术工人20人，日产牛皮革80张，产品有红皮、箱子皮等，在该厂带领下，出现了多家皮革厂，如永成、万华、德昌等，制革工业非常兴旺，持续繁荣到日本侵占广州之前。

东南亚华侨也投资广州的制药行业。广州二天堂制药厂是由越南华侨韦少伯投资的。韦少伯在越南堤岸建有二天堂总厂，在广州、曼谷建有分厂。广州分厂有职工110多人，在东山建有职工住宅，年营业额超过30万港币。日本侵占广州时被洗劫，战后恢复营业，是新中国成立前广州大型制药厂之一。1896年，新加坡华侨黄甫田、简银初等人经营桔香斋药厂，主要生产“甘露叶”，还有甘和茶、紫金锭等，产品70%在国内销售，30%销往东南亚各埠。

在化学工业方面，东南亚华侨高清亮等合资创建广州和平化妆品厂，产品以化妆品为主，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广州颇有名气。此外，东南亚华侨还办有广州艺成化

工厂等。

在交通运输业方面，东南亚华投资最早的是内河航运业。1910年，南洋华侨区慕颐为了方便广州市与海口市之间的运输。在广州市兴办侨轮公司，投资20万银元，购买轮船两艘，其中一艘拖轮载货300吨，可载乘客100多人，经营客货运输和拖引盐船。此外，菲律宾华侨余颂和美洲华侨合资创办同溢船务公司，另有菲律宾华侨和美洲华侨陈元优等合资创办大华安海公司等。1915年，马来亚一批归侨和华侨合资在香港购买残旧汽车运回广州，改装成出租小汽车，在广州市运行，时人称之为“野鸡车”，是当时广州市内惟一的陆上交通机动车。在广州市开办公共交通车以前，“野鸡车”是非常重要的市内交通工具，1932年结束营业。广州发展公共汽车后，主要由美洲华侨投资，东南亚华侨也有投资，如新加坡华侨创办有广州加拿大汽车公司等。

广州向来是商业重镇，华南地区的商业中心，商业繁荣，不少华侨投资于广州商业。早期民族资本家陈启沅在办起继昌隆缫丝厂后，为避免中间商盘剥，在广州自设昌栈丝庄，由其子陈蒲轩主持业务。1875年，越南华侨集资在广州办安南绸缎庄，专门收货销往越南，货源主要来自南海、顺德一带。新加坡华侨在广州办叻庄，经营广州土布杂货出口到新加坡，也从新加坡向中国输入商品。

在金融方面：东南亚华侨在广州投资的有华商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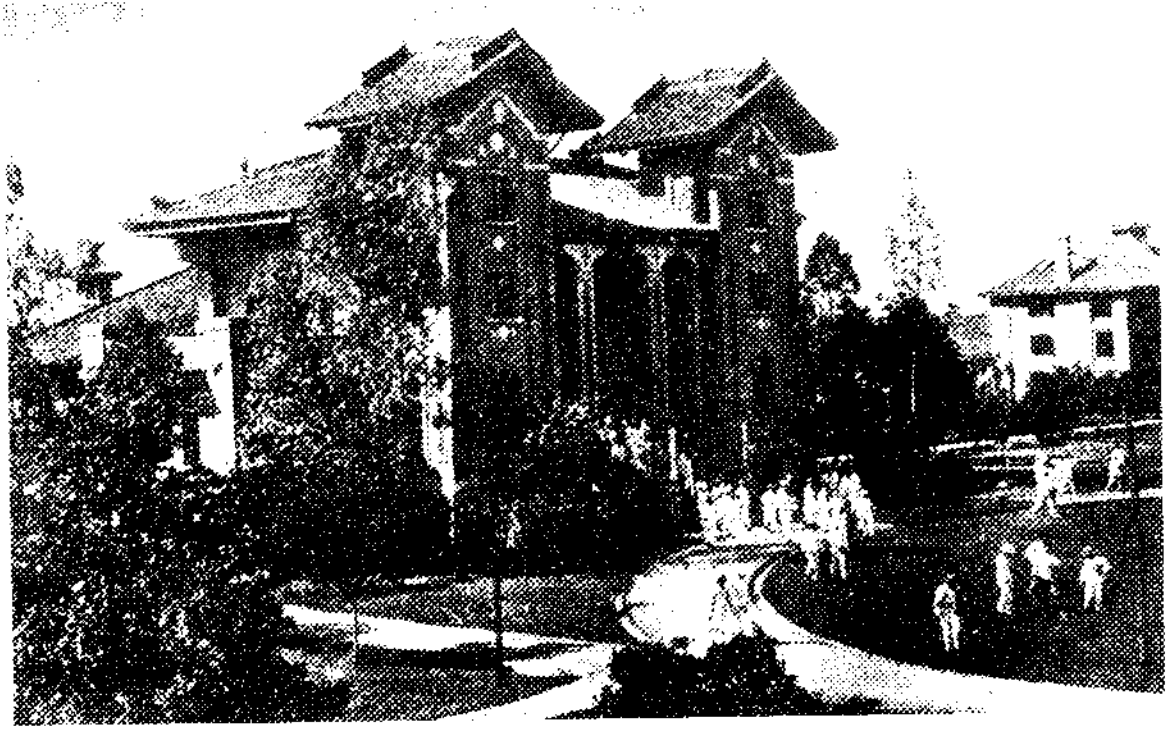
行、华侨银行、广州德信银行、广州华侨联合银行等。广州华侨银行1946年在广州设立，其主要特色是着重办理侨汇，吸收华侨资金投资国内。该行还在新加坡设立总行，在香港、西贡、曼谷设立分行，主要经营东南亚华侨业务。广州华美银行创建于抗战以前，该行不但吸收华侨资金向国内投资，还贷款给华侨创办企业，资助华侨子弟读书等，受到华侨欢迎。此外，在广州市，不同时期都有数目不定的侨批局的存在，1946年广州市有15个较大的侨批局，主要经营东南亚华侨侨汇的有永昌叻庄、南洋华侨批局、德昌行广州分号、鸿福泽记、兆汇叻庄、华侨庄等。大都由东南亚华侨或归侨创办。

在近代广州政治发展史上，东南亚华侨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如增城籍马来亚华侨郭继梅(枚)、花县籍华侨徐培添等很早就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1911年，孙中山发动广州起义，华侨郭继梅、花县旅越华侨徐廉辉、徐松根、徐昭良、曾日全、徐礼明等壮烈牺牲，为广州的民主革命做出了贡献。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得到东南亚华侨捐款捐物数额庞大，所以孙中山说“华侨是革命成功之母”。1925年，广州香港工人大罢工，反对帝国主义。东南亚各地华侨给予积极的支持，如泰国华侨一月内集资1800余元，大米100包，运送广州。印尼泗水华侨组织“华侨外交后援会”，先集资1.6万元，在上海买面粉运回广州，泗水华侨前后汇款10万元，支持省港工人大罢工。北伐战争期间，东南亚华侨

汇款寄物，支持革命者也很多。如越南西贡华侨李舜前、李栋等筹集巨款，购买军用装甲车一辆，送给广州的革命政府。从海外回国直接参加革命战争的东南亚华侨有数百人以上。抗日战争爆发后，从世界各地汇款到广州支持抗战的华侨更多。1938年，越南华侨汇国币4万元，为广东空军购买战机。不少东南亚华侨直接回国参战。如祖籍花县的越南华侨陈耀臣，1938年回到家乡，组织抗日自卫团，与日军交战80余次。祖籍番禺的马来西亚华侨黄益堂将儿子送回广州参加空军，其子不负厚望，在1938年的广州空战中，击落击伤日机各一架。

在近代广州文化发展史上，东南亚华侨也做了很大的贡献。如捐资办大学，1904年岭南学堂从澳门迁回广州，改名岭南大学，东南亚华侨捐建了张弼士堂、爪哇堂、陈嘉庚纪念堂、荣光堂、十友堂等。1927年，何香凝赴东南亚募捐，筹办广州仲恺农校，东南亚华侨踊跃捐助。新中国成立前得到华侨资助的中学有培英中学、培正中学、执信中学、广东华侨中学等。

建国以后初期，国内政治稳定，在国际上地位提高，东南亚各地大都政局动荡，东南亚华侨资本不少流向国内。1950年，华侨仅在广州市工业方面的投资达27万元，至1954年，华侨在广州投资工业方面有65.5万元，分布行业有漂染业、针织业、榨油业等。如裕侨漂染厂，1951年2月创建，投资28万元，职工40人，有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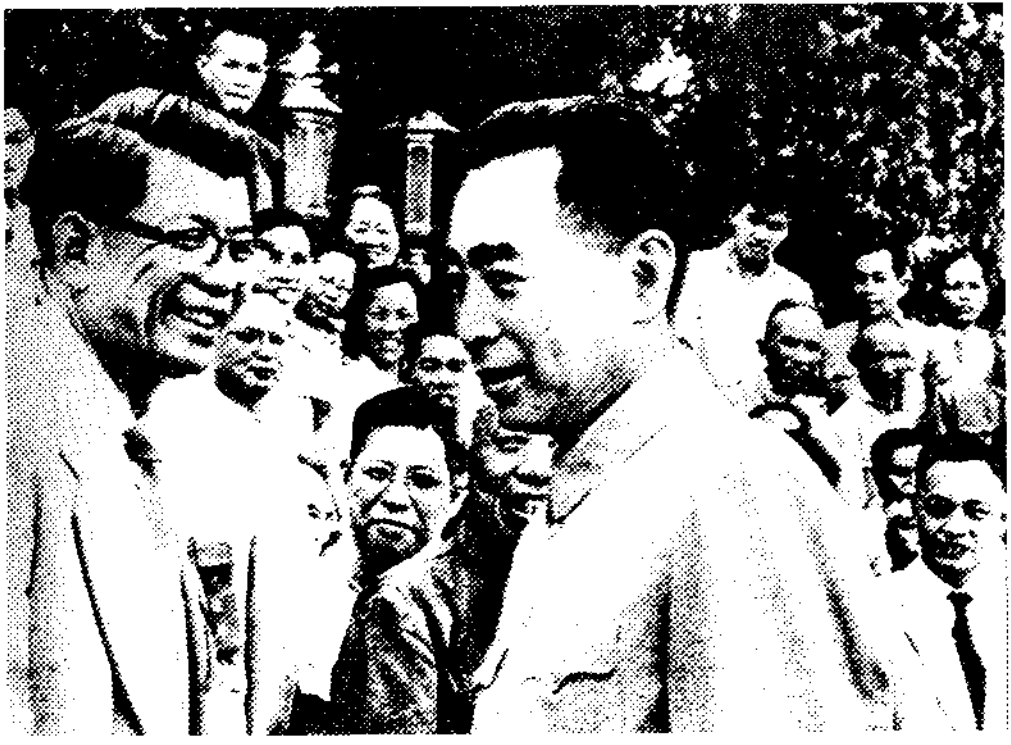


岭南大学旧址（今中山大学所在地）

台卷染机。友光织布厂，投资17万元，年产布190万米，是当时规模较大的侨资厂。商业方面，侨资投资广州16户，黄金94万元，有药行、文具业、陶瓷业、烟草业等。在侨资的150多万元资金中，其中来自印尼侨资35万元，新马35万元，越南20万元，泰国10万元。广州在建国后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主要口岸，也是华侨出入祖国的大门，有很多便利的投资条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4年中，广州市华侨投资金额占全国的62%。公私合营的大型企业“华企”和“华建”都设在广州。

公私合营华侨工业建设公司：1951年3月，旅居印尼的黄洁、薛西清、王源兴、李祝朝、施子卿五人组成考察团回国，4月抵达广州市，了解广州工业生产情况，后又北上到北京、武汉、天津、青岛、上海等地参观考察，最后决定在广州投资。1951年8月在广州成立“公私合营工业建设公司”（简称华建），由黄洁出任董事长。公司计划投资1000万元，实际投资575万元，侨资占72%。公司初期实行“以商养工”的方针，1952年开始向工业发展，首先发展麻纺业。同年投资450万元，在广州市赤岗兴建华建麻袋厂。1953年投产，有机器61台，工人202人，工人大多数是归侨。1953年产量为25万条麻袋，1954年达276万条，1954年赢利136万元，1956年与广东麻袋厂合并，定名为公私合营广东华建麻袋厂。

公私合营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50年港澳工商



周恩来总理会见华侨投资公司创始人之一黄复彪

界爱国人士发起在广州成立本公司，对外发行股额，募得资金 445 万元，其中私人资金 286 万元，侨资占 105 万元，主要是东南亚华侨刘家祺、刘森庆、刘宜应等人的投资。公司实行以商养工的策略，经营进出口贸易，贸易额占当时广州市私营进出口额一半以上。不久，开始将资金投入工业建设，1953 年投入工业资金 236 万元，1954 年投入 268 元，设立广州三联织绸厂、广州南方针织厂等工厂。

为更好地招引华侨和港澳同胞的投资，将资金更好地投入到国家建设上来。1955 年 3 月，广东省组建广东华侨投资公司，接收华企、华建和广州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资金，并继续扩大招股。从 1955 年 3 月至 1969 年，广东华侨投资公司的资本由 9571150 元增至 71577940 元，公司从资金中筹资建设企业 32 间。资金投入工业占 79%，农垦占 13%，旅游服务占 8%。广东华建麻袋厂是由原广东麻袋厂和华建麻袋厂合并而成的，日产麻袋由 1 万多条增至 1.6 万条，工人由两班制增至三班制，年产麻袋增至 290 多万条，合并第一年赢利 150 万元。广州苎麻纺织厂，1956 年由华侨投资公司投资 2000 万元在广州东郊员村建立。年产麻布 1.8 亿米，帆布 200 万米，产值 290 万元，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苎麻纺织厂，产品畅销国内。1959 年为广东苎麻厂合并，1964 年改名广州绢麻纺织厂。在旅游服务方面，1955 年创办了广州华侨宾馆，1956 年建设华侨大厦，专门用来接待海外华侨和港澳同

胞，1969年广东华侨投资公司撤销，业务转交中国银行。1980年公司恢复后更名为广东省信托投资公司，1988年两公司分立，各自营运。华侨投资公司仍从事吸收华侨和港澳同胞资金进行投资国内建设的业务。

从1979年起，全国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中央对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因为广东毗邻港澳，有众多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又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惟一的对外贸易中心，与海外长期以来有密切的联系。中央希望广东能够利用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的资金技术率先开辟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路。60年代后期，东南亚地区经济迅速发展，当地华侨华人经济也取得了长足发展，出现了不少华人大企业家和华人企业。在泰国，华人陈弼臣创立的盘谷银行是东南亚第一大商业银行。印尼最大商业银行是林绍良家族的中央亚细亚银行。新马丰隆集团郭氏家族资产超过20亿美元，新加坡华侨银行也是华人私有银行，资产也超过10亿美元，此外，如印尼李文正家族、新加坡大华银行、泰华农民银行等都是有一定实力的华人银行。在工业方面，有“新马纺织业之父”李天炜的李氏宗族，新加坡“罐头食品大王”杨氏家族，泰国“纺织大王”吴乾基、“钟表大王”吴氏兄弟，印尼林绍良家族、谢建隆家族，马来西亚郭鹤年家族等都在世界工业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东南亚华人经济的一个发展特点之一是日益国际化，在走向国际市场的道路上，

香港是最重要的中转站。东南亚不少华人企业，均将部分资金转到香港，或者通过香港这个金融中心再投资于其他地区。

1980年广东省复办华侨投资公司，易名为广东信托投资公司。1983年改名为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次年下设华侨投资部，主要业务是：发行华侨投资股票，吸收华侨侨眷资金，为广东省重点建设发行人民币债券等。广东信托公司针对华侨业务主要在港澳地区展开，吸收的资金不仅有港澳同胞的投资，也有不少东南亚华人在港澳地区的资金。在80年代，广东信托公司利用吸收的资金办了上百个企业，并协助港澳资金和华侨华人资金在珠三角等地创建了一批三资企业。除了通过信托公司外，东南亚华侨华人直接在广州也有不少的投资，比较有名的如泰国正大集团的广大畜牧（广州）有限公司、新加坡“罐头大王”杨氏家族的杨协成有限公司等。改革开放后，广东省所吸收的外资投资中，近80%是港澳台和海外华人资金，其中不少是东南亚华人资金。

羊城纸箱厂：1979年10月，新加坡著名企业家陈德熏回国参观，决定给广州捐献100万美元的瓦楞纸箱自动生产线，兴办羊城纸箱厂。他亲自到日本选机械，到广州选厂址，建成后，又提供了各种零配件，并积极为工厂提供国际上的行业信息，使工厂产品达到国际化的水平。由于技术领先，管理完善，消息灵通，羊城纸箱厂

的产品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广州万宝冰箱厂、珠江钢琴厂均使用该厂的包装产品，改变了广州包装业落后的局面，是国内成功的侨资企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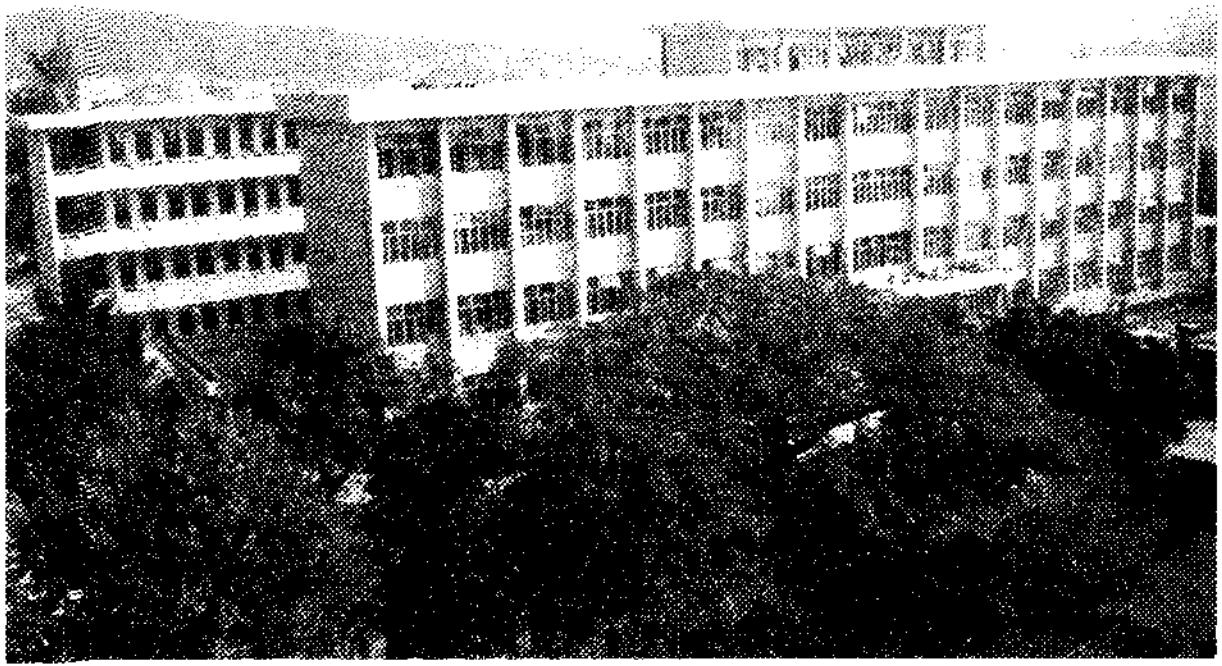
广州市侨业有限公司：印尼归侨陈玉宏于1982年集资创办。主营制造、加工服装，兼营批发零售家用电器等。该公司下属服装厂由一间变为多间，企业经济效益好，并兼办安排一些归难侨的工作，社会效益显著。

广州市华侨眷属创办企业从1981年开始，目前已发展到上千家。由于国内长期以计划经济为主，公有制经济占主体，私人不可能拥有大笔资金，所以侨属办企业的资金来源大都是海外华侨华人。在侨属办企业过程中，华侨华人从海外或提供资金，或提供生产设备，或代购生产线，或帮助销售产品，提供商业信息等，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目前，广州市府下属的侨属企业著名的如侨光实业公司、广州鸿侨公司、广州橡胶侨联实业公司、广州邵裕兴制衣厂、广州市裕侨工业贸易发展公司等，东山区属的侨属企业有广州市上工电热品材厂等，海珠区属下有伟业制衣厂、先进电动工具行、侨星玻璃工艺厂、中顺汽车服务公司、侨达机械厂，荔湾区侨属企业有侨声工艺电子厂、华发机械厂、新侨五金建化公司等，其中不少资金都来源于东南亚华侨华人。

新中国成立以后，不少东南亚归侨致力于祖国建设，很多人由于工作努力还走上了领导岗位，如马来亚归侨梁灵光、印尼归侨黄洁、新加坡归侨庄田、黄清渠

都曾作过广东省长或副省长、广州市长等。菲律宾归侨黄长水、泰国归侨钟非做过广州市副市长，印尼归侨黄积修做过番禺县副县长、马来亚归侨廖仲兴做到从化县副县长县长，马来亚归侨吴宏远做过海珠区副区长，马来亚归侨朱朴、新加坡归侨郑莫做过东山区副区长，都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后，东南亚华侨非常热心赞助祖国的文化事业。扩建增建校舍是最普遍的捐资教育的形式。广州及珠三角地区，上至大学如中山大学、暨南大学、中山医科大学、五邑大学、肇庆大学等，下至中、小学如培正中学、执信中学等，不少东南亚华侨华人捐赠了巨款，用来修盖校舍，建教学楼、实验室、宿舍楼。尤其江门、佛山、中山等地，几乎所有的中小学都接受了海外捐款，捐赠者中东南亚华侨华人占了很大的比例。1958年暨南大学在广州市重建，华侨热情赞助。1958—1966年，共捐款人民币146万元、港币14万元。1978年后捐资热情更高，已捐资上千万元。泰国华人颜开臣捐有暨大校友活动中心，并与校友共设奖学金。1978年后，中山大学所收到的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同胞的捐助是全国高校中最多的，已超过1亿元人民币。东南亚华人中有名的如马来亚华人姚美良捐建永芳堂和孙中山纪念馆。除大学外，不少华人热心捐助中小学。1954年，广州市筹建华侨小学，得到印尼棉兰、越南西贡等地东南亚华侨的热心赞助，华侨小学主要招收东南亚的侨生，



中山华侨中学

曾多次获得全国教育红旗单位。1980年，东南亚华侨张耀宗捐资500万元兴建番禺石岗东学校。增城是著名侨领马来西亚华侨郑景贵的故乡，他的后人在80年代先后捐建了育才小学、郑中钧中学，参捐了华侨中学，为广州市的教育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新加坡归侨江静坡，是著名的无脊椎动物学寄生虫学专家，生前任中山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在动物学研究领域取得卓越成果，获英国皇家医学研究院授予的热带病学研究奖，被法国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院授予外籍院士。越南归侨余竣南，是著名建筑师，曾设计了广州友谊剧院、广州市少年宫、白天鹅宾馆等。著名教育家、社会学家陈序经，是新加坡归侨，曾任岭南大学校长，中山大学副校长，在社会学和东南亚古史研究上做出了卓越贡献。泰国归侨卓炯，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曾任广东省社科院副院长，他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是中国改革开放理论的重要理论家。马来亚归侨杨先宋是著名的水稻专家，因在水稻丰产研究做出重大成果，获科技进步二等奖，“广东省突出贡献专家”等称号。

新中国成立以后，东南亚华侨华人还为广州的医疗、文体等公益事业捐助了不少资金，为广州社会建设做出了努力。如兴建扩建医院，兴修水利，兴办养老院、幼儿园、福利院等，都显示了华侨华人与祖籍地割不断的亲情。

二战以后，东南亚各国不同程度地加强了对华人的同化措施，加强了华人对当地国家的认同感，尤其第二代以后的华人对当地的认同加深，对中国只认为是祖籍地，没有太多的感情。他们对中国建设的热情已不如第一代华侨，即使他们在中国投资办厂，也是看中优越的政策条件和可观的市场前景，从经济利益的角度进行的决策，不是为了建设祖国的目的。因此，对当前东南亚华人与中国的关系我们应当有客观的态度和冷静的分析。

主要参考书目

陈烈甫：《东南亚的华侨、华人与华裔》，台北正中书局1979年版。

吴凤斌主编：《东南亚华侨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温广益主编：《二战后东南亚华侨华人史》，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印度尼西亚华侨史》，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

《世界华人精英传略》（泰国卷、新马卷、印尼卷），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冯子平：《海外春秋》，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英]布赛尔：《东南亚之华侨》，台北正中书局1966年版。

萧远辉、张应龙：《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战后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华人政策》，暨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张文和：《越南华侨史话》，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

份有限公司 1975 年版。

崔贵强：《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会 1994 年版。

何宣武：《华侨经济研究》，台北侨务委员会 1971 年版。

戴鸿琪：《印度尼西亚华侨经济》，台北海外出版社 1956 年版。

汪慕恒主编：《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李白茵：《越南华侨与华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廖建裕：《印度尼西亚华人：文化与社会》，新加坡亚洲学会 1993 年版。

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华侨沧桑录》，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李国卿：《华侨资本的形成与发展》，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新加坡 1967 年版。

林水豪、骆静山：《马来西亚华人史》，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 1984 年版。

游仲勋：《东南亚华侨经济简论》，厦门大学出版

社 1987 年版。

王庚武：《南洋华人简史》，台北牛车水出版社 1969 年版。

《星马的开发与华侨移民》，南洋大学历史系 1971 年编印。

邝守愚：《二十世纪之南洋》，商务印书馆 1934 年版。

本套丛书使用的照片得到以下单位和个人的支持与协助，特此鸣谢！

香港艺术博物馆
《珠江风貌——澳门、广州及香港》
《广州历史文化图册》
《七海扬帆》
《中国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遗址》
《中国广州：中瑞海上贸易的门户》
《凤浦古今》
《广州十三行沧桑》
《旧中国杂记》
《新加坡华人会馆沿革史》
《海程志略》
《胡志明市的会馆》
《侨联四十年》
《侨联三十年》
《粤海关志》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广州文化博览》
《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发现中国》
《走向世界丛书》之一《西学东渐记》
赵殿红　胡根　梁承邺



广州与海洋文明系列

责任编辑：柏　峰
赵殿红
封面设计：方楚涓
版式设计：翁少敏
责任技编：黎碧霞
ISBN 7-218-04179-5/K·857
定价：（全八册）80.00元

ISBN 7-218-04179-5
9 787218 041797 >